

往 思 录

葛剑雄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思录/葛剑雄著.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4.1
ISBN 978-7-5642-4280-0/F·4280

I. ①往… II. ①葛… III. ①葛剑雄-文集 IV. ①C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99909 号

☐ 责任编辑 江 玉

☐ 封面设计 桃 夭

☐ 封面题字 林 健

☐ 内页治印 林 健

往思录

葛剑雄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24 年 1 月第 1 版 202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24 印张(插页:2) 401 千字
定价:128.00 元



葛剑雄 籍贯浙江绍兴,1945 年出生于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96—2007 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2007 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其间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2007—2014 年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人口史》(主编,第 1 卷作者)、《中国移民史》(主编,第 1、2 卷作者)、《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往事和近事》、《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历史学是什么》、《黄河与中华文明》、《天地史谭》、《葛剑雄文集》(1—7 卷)、《我们应有的反思》、《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史》、《葛剑雄说城》、《四极日记》等数十种,发表相关论文百余篇。

童年记忆

人生之初 / 3

故乡小学杂忆 / 6

与书无缘

——故乡童年的回忆 / 10

初中生活忆旧 / 12

永远的母校 / 17

通古今之变的南浔 / 19

童年生活中的江南“粪土” / 22

青春无奈

我在市北的不幸与大幸 / 29

偶涉经典亦受益无穷 / 32

时代性的人性扭曲

——特殊年代中的双重人格现象 / 34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 41

当年“样板” / 52

我所经历的抄家 / 64

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 71

往 思 录

青春无奈(二则) / 78

病室忆旧 / 83

我记忆中的北站 / 86

治学问道

我的 1978 年 / 91

我的博士研究生经历 / 98

四十年梦想 / 104

我与改革开放:为学四十载 / 106

我的人口史梦

——《中国人口发展史》的自我介绍 / 116

复旦教授不仅敢说“我不知道” / 125

杂说知识分子 / 127

被高估的民国学术 / 133

功夫在“书”外 / 137

书缘终身

我的书和书房 / 145

我的新书房 / 151

藏书的归宿 / 153

未建成的施坚雅文库 / 160

图书馆的难题 / 163

我为藏书找到了归宿 / 167

生活经历

我当市人大代表 / 173

1982 年的记忆:搬家 / 179

我与游泳 / 182

我与上海 / 187

我的人文观 / 189

财富断想 / 202

会海一勺 / 207

觅食经验看排队 / 215

访台琐记 / 217

安检种种 / 222

杂忆乘飞机 / 226

《成蹊集》序 / 238

世纪杂感 / 242

往矣昔人

超越死亡 / 251

真正的学者

——悼石泉先生 / 254

记忆中的筱苏(史念海)先生 / 256

怀念侯仁之先生 / 259

最忆康桥风雪时 / 263

汪老远行感言 / 266

我所知的俞大缜 / 269

雁归来兮寻根 / 271

亡友李仁一年祭

——特殊年代的特殊情谊 / 273

《周有光百年口述》读后 / 275

稽山仰止 越水长流

——怀念陈桥驿先生 / 279

《陈桥驿学术论文选编》序(节选) / 284

读史阅世皆求真

——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 287

忆何炳棣先生 / 289

人天永隔竟如斯 / 298

忆旧之难

——并谈一件往事 / 301

忆旧还是难 / 305

愿阁楼里永远有这盏灯

——读沈昌文《阁楼人语》 / 308

老沈的吃局 / 311

万里记踪

我的非洲情(代序) / 317

非洲之行看历史 / 324

我到过的南极 / 350

寻访李约瑟 / 360

邂逅霍金 / 368

村山富士印象 / 370

万里之行 始于船上

——《行万里路》自序 / 372

校后记 / 376

■ 童年记忆

人生之初

一个人的生命自然是从脱离母体开始的,但其记忆和记录未必同时开始。记忆是主观的,既取决于脑活动的成熟程度,也取决于所受到刺激的强度。在没有录音的条件下,自我记忆只能从识字、写字开始。非自我的记录则取决于客观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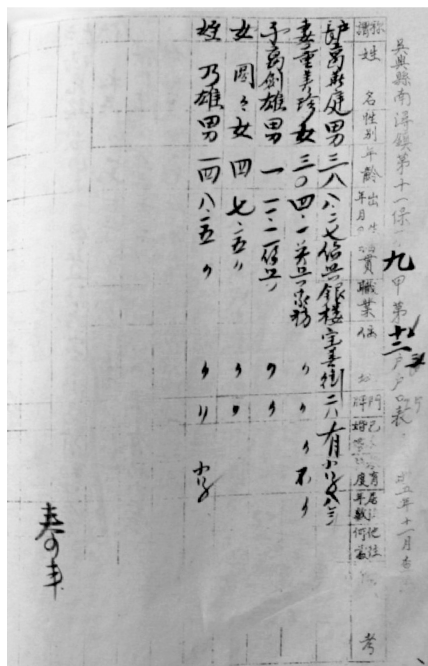
1945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早上,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宝善街家中。具体时间从未有人告诉我,我始终不了解,因为那时没有出生证,也没有任何其他书面记录,家人最多记个时辰。解放后,“生辰八字”属封建迷信,家里没有人再提,我自然不知道我出生在哪个时辰。

这个世界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我从睡梦中被惊醒,已经坐在床上的母亲赶快将我抱起,说着“不要怕,不要怕”。外面天还没有亮,屋里点着洋灯——煤油灯。地板上睡满了人,好像都已经起来了。两个陌生人在说着什么,一会儿推开门走出去了。后来父母亲告诉我,当时南浔镇上来了很多兵,还传来枪声。我家的房子不临街,建在原来一座烧毁住宅的房基上,地势高,还有面街的围墙。从沿街一家店铺的后门进来,要走上几级台阶,推开墙门才能进来。所以当天就有沿街的邻居来我家避难,晚上就在两间房间内“摊地铺”过夜。父亲与众人将墙门堵死,在墙上架梯子出入。那天天还没有亮,两个国民党军队的散兵翻围墙进来,又从窗口跳进房间。面对惊醒的众人,他们不停地说:“老乡,不要害怕。求你们给我两件旧衣裳。”拿到衣服后就将军装换掉,然后又翻墙离开。

我请南浔的朋友查了,南浔是1949年5月2日解放的,那天应该是5月1日,当时我3岁5个半月。

以后的印象更清晰,邻居都走了,家里又恢复原样。过了几天,街上传来鼓号

声,大人牵着我到街上看热闹,南浔中学的学生在游行,学生们敲着洋铜鼓,吹着号,拿着彩色标语旗,喊着口号走过。晚上有提灯会,参加的人提着各式各样点了蜡烛的灯游行聚会。父亲给我用红纸在竹架上糊了一个五角星小灯,里面还点着小蜡烛。我兴高采烈地提着这盏小灯站在大街边上,可是一阵风吹来,蜡烛火将纸烧了,提灯的绳子也断了,只剩下一个竹架掉在地上。



葛剑雄先生一岁(1946年)时的户籍登记册

前几年南浔的陆剑兄在旧档案中发现了我家的户口表,拍了数字照片送给我。这是一张油印表格,用毛笔填写的“吴兴县南浔镇第十一保九甲十二户户口登记表”,注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查”。上面的栏目有关系、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年月日、籍贯、职业、住址、门牌、已婚未婚、教育程度、居住年数、他往何处、备考共 14 项,相当详细。第三行就是我,填着:(关系)子,(姓名)葛剑雄,(性别)男,(年龄)一,(出生年月日)一一、一一,(籍贯)绍兴,(地址)宝善街,(门牌)二八,其他各栏空白。这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关于我的最早记录。表上填的显然是农历,我出生于十一月十一日(公历是 12 月 15 日),正好满一岁。

表上登记的地址是宝善街 28 号,但这不是我的家,而是父亲买下的一间沿街门

面房,与我家前面的店铺相隔几个门面。父亲从绍兴到南浔学生意,在王宝成银楼当学徒,满师后留在店里工作。日寇侵占南浔后,老板王士坤逃难去了上海,但店里还有几十两黄金没有带走。父亲及时妥善保管,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黄金隐藏在一只新马桶里,躲过日本兵与汉奸的一次次搜查,送到上海王士坤家。王士坤感激不尽,在父亲结婚时送给他一块“火烧白场”(被火烧毁的房屋废墟)和北面一堵残留的围墙,我家的两间住房就是在清理后的原存地基上建造的。这堵围墙又高又厚,1980年南浔镇供销社收购我家房屋时,这堵墙的估值几乎是房价的一半。为了证实我家的产权,供销社还专门派人到上海找王士坤核对过。王士坤还资助父亲自立门户,开了一家“银楼”,实际只是加工金银首饰的小作坊,老板和伙计就是父亲一人,开在宝善街28号。表左侧写的“泰丰”两字,是店名,我幼时还在家中找到过一大叠印有“泰丰银楼”广告的包装纸。

表上的内容还纠正了我家一个一直存在的错误。表上第五栏记着:侄,乃雄,男,一四岁,八、一五出生,籍贯绍兴,教育程度小学。他是父亲的堂侄,家里托父亲带他出来学生意,年纪还小,就住在我家,做些杂活和家务。解放后浙江省禁止私人经营、加工金银首饰,父亲关门失业,他则回了绍兴老家。父母亲一直叫他 Nan Yu,大概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有限,让我将他的名字写为“南育”,并且误以为葛家我们这一辈是“南”字辈,现在才知道应该是“乃”字辈。

表上还有些不该有的错误,说明当事人的粗疏低效。父母亲的年龄都错了:父亲出生于1912年,1946年应该是34岁。即使用虚岁,最多写成36岁。母亲出生于1921年,1946年应该是25岁,虚岁至多写成27岁。父亲没有正规上过学,母亲倒是在南浔镇上上小学,表上却被填为“不(识)”。至于我的姓名排在年长我三岁的姐姐的前面,而她排在我后面并只填名字,无疑也反映了当时重男轻女的惯例。

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着比较完整的解放前的户籍卡,“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我作为学校“专案组”成员,凭“闸北区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去查过。想不到南浔镇也保存着这些档案,并且被陆剑兄发现,使我有了人生最早的记录。

现在国内有些高龄纪录得不到国际机构的承认,原因是找不到原始的出生证或可靠的出生记录。如果我今后有幸创下高龄纪录,这一页户口登记就是可靠的出生记录。

本文写作于2023年10月。

故乡小学杂忆

两年前，吉林电视台拍摄《回乡》系列，将我也列入其中，于是摄制组随我回到我的出生地——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当天下午，我来到曾经就读的小学，原地几乎已经无法辨认。从一条巷子绕到背后，终于找到了一排似曾相识的旧平房，现已辟为民居。据住户中一位老者说，这就是当年小学的教室。我入学时，学校名为圆通小学，后改名浔北小学，那时的南浔镇属吴兴县。

我上学的时间很早——1950年9月，年龄四岁零九个月。据说是因为年长我三岁的姐姐上学，我跟着去玩，到校后就不肯回家，一定要上课。老师就让我坐到一年级教室里，与新生一起上课，见我很认真，就同意了。学校是利用圆通庵改建的，以后学了历史，才知道这圆通庵曾经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大事。清初南浔庄氏私修《明史》案导致七十多人被杀，这惹祸的《明史》就是在圆通庵修的。但当时我只知道校舍的门槛很高，我跨不过去，每次都要大同学或老师帮助。由于年龄小，个子也小，两年后才正式升级。

学校很小，设施简陋，但也有礼堂和操场。因为我从小不喜欢运动，所以对操场已经没有什么印象。那礼堂大概是原来的佛堂，已经改建，搭了一个台。大概三年级时，班主任韩学农老师为我排练一段快板，参加全校的演出。快板的内容是老农民拥护粮食统购统销。他亲自将我化妆成老头，穿上一条“作裙”，挑着一担“粮”。我一走上台就引来全场关注，谁知刚开始说话，扁担一头的绳子断了，韩老师不得不上台救火。

另一次是全校的演讲比赛，也是上台讲。这次我还获了奖，奖品是一本“千用簿”。其实就是在块蜡板上铺了一张半透明的薄纸，用不太尖的竹笔在上面写字

画线,可在纸上见到痕迹。而将纸提离蜡板后,上面痕迹即消除。如此可反复使用,节约对我来说很贵重的纸笔。实际上用不多久纸就破了,但当时的确让我既兴奋又荣耀,也引起同学们的羡慕。

虽然是在小学,频繁的政治运动也已是我们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在这样的镇上,任何运动都是全民动员,我家门前的宝善街和附近的大街上装的广播喇叭不是宣传就是演唱,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增加新的记忆。例如有段时间,不断播放越剧演员袁雪芬唱的歌颂新婚姻法的曲子,以至到今天我还记得“千年枷锁已打碎,封建礼教如山倒”等内容。斯大林葬礼那天,我们正在空地上看人放风筝。忽听到喇叭里传来汽笛声,周围人肃立,我们也赶快站好。只见一只风筝脱线飞走,放的人也不敢去追。等肃立完毕,风筝早已不见踪影,大家连叫可惜。

有一段时间,镇上到处在开会学习,不知是哪次运动。连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也天天晚上去学习,地点在原来的耶稣堂。参加学习的都是妇女,不少人带着孩子,一起在门外或过道里玩得很开心。有时妈妈们唱起歌来,我们都挤在门前窗口看,觉得很新鲜,所以巴不得母亲天天晚上带我们去开会。

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又是另一种景象。除了喇叭里天天不断宣传、喊口号外,深更半夜也会有人在街头巷里巡逻,边敲锣边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时听大人说,某家某人被抓,“解湖州”(押送县城)了。最可怕的还是听同学描述枪毙人,说亲眼看到脑袋开花,白色的脑浆与血一起流出来,有的还说枪打过人头被削掉一半,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同学吓得晚上做噩梦。虽然枪毙人的地方离我们家并不远,但大人不许我们去看,我也从来不敢去。

另一些运动就连小学也参加了,并且都很积极,比如欢迎志愿军伤病员、各种游行,特别是爱国卫生运动。记得在抗美援朝时,听说美帝发动细菌战,例如在附近某地扔下了细菌弹,有致鼠疫、伤寒等的细菌,还放在糖果中引诱孩子去捡。老师教育我们路上的东西不能随便捡,发现可疑要立即报告。这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到老鼠就想到鼠疫,害怕被传染。

南浔镇被评为爱国卫生先进镇,其中少不了小学生的功劳。有一位名叫王阿金的老太作为代表去北京开会,见到了毛主席,南浔作为卫生镇的名气也更响了。卫生镇的标准之一是无蝇,于是就得不断灭蝇,小学生成为主力,每个人都有任务,必须消灭多少个苍蝇。下课后,我们就带上自己做的苍蝇拍和盛着散石灰的空火柴盒

出发了。我们的蝇拍是用废纸板剪成长方形或椭圆形，上面打些孔，中间插一根竹柄。这样的蝇拍打起苍蝇来比较费劲，容易破，而且用力太猛了会把苍蝇打扁打烂，看了恶心，还不便统计数字。但商店里卖的纱面蝇拍我们是买不起的，虽然用起来很方便。因为要完成任务，且最好要超额，所以我们专找苍蝇多的地方，如“羊木行”（制革作坊）。那一张张被钉在木板上的新鲜羊皮，表面还能看到血丝，会引来大量苍蝇，正是我们扩大战果的好机会。上交死苍蝇时要统计数字，开始时一个个数，后来改为称分量，以两为单位。我大概没有什么突出表现，所以没有像演讲比赛那样得奖。

与运动配合的还有歌曲，学校里教，更多的还是喇叭里播放，游行时唱。所以我不仅会唱少年儿童唱的，如《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还会唱中学生和成年人唱的歌，也会唱流行的苏联歌曲。记得有一次看游行，见队伍中有人扛着一棵连根拔起的柳树，喇叭里播的是：“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天空出太阳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要把帝国主义连根拔那个连根拔！”这样的歌至今我还能记得，足见当初印象之深。

大多数同学家里都很穷，但我家更穷。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是“银匠”，在宝善街一间街面房为人加工金银首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浙江省取缔这一行业，父亲就此失业，一家五口只能靠借贷和变卖度日。先卖家中存下的零星首饰，再卖铜锡用具。由于浙江省停止收购金银首饰和铜锡器，又禁止将其带出省，父亲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偷偷送到邻近的江苏省去卖。坐吃山空，何况家里根本没有山。他曾与两人合伙开过一家小文具店，没有多久就关了门。几年后他去上海谋生，但经常没有钱带回家来。直到1955年他掌握了土法制造钻头的技术，于是让母亲也去上海摆摊推销，生活渐趋安定。为了省钱，家里经常买最便宜的黑面粉，吃菜粥。但最难对付的还是开学时交学费、书簿费，姐弟三人上学，经常连书簿费也交不起。开学时，看到其他同学领了新书，自己则一直在担心，不知哪天会被老师赶出教室，好在老师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说话总不算数，一再宽限。有一次，开学已经几天，我已吓得不想上学，舅父得知后送来了救急的钱。

到读完五年级，我从来没有买过一本书。但我从小喜欢看书，只要有字的纸都会拿着看。无论是糊墙的“申报纸”（当地当时对旧报纸的通称），还是偶然得到的一本旧书、一张字纸，我都会看，无论懂与不懂。有一次舅父从他就读的平湖师范回

来,带给我们几本连环画报,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五年级时姐姐进了初中,她的课本成了我的读物。只要她在家,我就从她书包里翻书看,特别是文学课本,我从第一课《论语》选读的“学而时习之”起,差不多每篇都背得出。只是好多字都念错,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除了5岁时随父亲回过一次原籍绍兴外,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南浔镇。最远的一次是学校组织“远足”(春游)去了十几里路外的江苏震泽镇。另一次“远足”是去沈庄漾“露营”,晚上在古坟台上搭帐篷睡。四年级时我参加的一个集体节目被挑选到县里演出,要乘轮船去几十里外的菱湖镇,但自己要付几毛钱买船票,我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别人替补。1957年,父母在上海安顿下来,那年暑假让我转到上海读书。当轮船在夜色中驶离码头,我整夜未曾入睡,想象大上海的景象,直到江上的大轮船、江边的厂房和烟囱出现在晨光中。

开学后,我成为上海闸北区虬江路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到今天已过半个世纪。但故乡的小学生活不时会浮现在眼前,当年的艰难苦涩都已淡去,留下的只是难忘的记忆。

原载蒋保华主编:《小学学什么——精英是这样炼成的》,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与书无缘

——故乡童年的回忆

1945年12月15日，我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尽管这个江南名镇以藏书数十万卷的刘氏嘉业堂闻名，又以“四象八牛七十二条蛟黄狗”（不同等级的豪富）称雄，但我的家庭却与书籍和财富无缘。

我的父亲出生在浙江绍兴农村，十几岁背井离乡到南浔当银楼学徒，以后自己开一家小店加工金银首饰，唯一的学徒兼帮工就是从家乡来的一位堂侄。我的母亲出生在安徽徽州，外祖父从徽州到南浔米店当学徒，满师后当店员，以后自己开了一家小米店，才将家属接到南浔。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祖父母和父亲一辈的其他亲人都已去世，在南浔镇上只有母亲一方面的亲戚，也只有我的舅父一家。父亲读过两年书，识字不多，字也写得不好，却有一手绝技，能在首饰上镂刻工整的楷书，如在“名字戒”上刻上一对新人的姓名。南浔镇得风气之先，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有女校，母亲也得以读完初小。文化程度最高的是我的舅父，在新中国成立前读了初中。所以到上学前，我从来没有在家里看过什么书，能够玩的是“假钞票”（贬值或作废的旧币）和印着不同图画“香烟牌子”。父亲有一位堂姐是信教的，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留下了一部《马太福音》。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觉得里面的纸很光滑，就悄悄撕几张下来折成纸蝙蝠玩。

1950年秋季开学，我还不满5岁，跟着刚上学的大孩子到附近的圆通小学去玩，一去就不肯回家，一定要随他们进教室上课。那时没有什么入学的年龄规定，教师看我坐着很认真的样子，就答应让我上学了。唯一的麻烦是，由圆通庵改成的校舍有几个门槛很高，我需要由别人帮助才能跨过去。以后学了历史，才知道这圆通庵就是当年庄廷鑑的父亲为他刻《明史》的地方。

就在我刚刚跨入校门不久，当地政府禁止私人经营和加工金银首饰，父亲一下子丧失了谋生的手段。浙江省还停止收购金银首饰和铜锡器，家中剩下的一点首饰无法变成现钱，生活立时陷入困境。后来打听到江苏省还在收购，父亲经常在天不亮时就带上家里的铜锡器或首饰，赶到邻近的属于江苏省的小镇去，变卖一些钱来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同时他还千方百计找活干。但这个商业市镇已有大批商店关门歇业，失业的人很多。为了省钱，家里连最便宜的米也舍不得买，而是买更廉价的整包黑面粉，每天自己加工面食。

每当开学时，我们就要担心父母还有没有交书学费的钱，要是没有，学校还能不能让我上课。有一次，直到正式上课的那天早上，舅父才替我交了学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自然不敢再有买书的奢望。直到读完小学五年级离开南浔，我从来没有买过一本课本以外的书籍。有一次在平湖师范读书的舅父给我们带来了几本连环画册，就成了我反复看的课外读物。读五年级时，姐姐进了初中。当时初中语文分成文学和汉语两课，文学课本中选了很多古典诗文。我饥不择食，就把她的文学课本当成我看的书，居然将里面的诗文都背了出来。后来知道很多字的音都是念错的，意思就更不明白了。

如果我不离开南浔镇，或许还只能继续那样看书。但到1957年我转学至上海，与书无缘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以后我学了历史，特别是研究了历史地理以后，对南浔镇的过去越来越了解，童年的记忆也由苦涩而变得温馨，因为当时所见所闻而今早已烟消云散，或物是人非，或人、物两亡了。国内外的同人知道我生长在南浔，皆称羡不已，或以为我有什么家学渊源，或拔高为“人杰地灵”，我却至今想不出一个所以然，还是老老实实写下这段经历。

本文写作于2001年7月。

初中生活忆旧

1956年暑假,我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浔北小学五年级转学来上海,此前我父母先后到上海谋生,依靠从事个体劳动所得已有条件供养我在上海上学了。我家租住的房在闸北区,我到区教育局办转学手续。看了转学证书,教育局的办事人说要考试,成绩合格才能接受。几天后接到通知,我已被转入离家不远的虬江路第一小学,升入六年级。这所小学的本部是虬江路上一片老旧平房,六年级两个班在分部上课,是一所被接管的私立小学,就是弄堂里一所三层楼民居,除简陋狭小的教室外,没有任何活动场所,体育课和广播操只能利用这条弄堂。幸而马路对面有一个免费开放的交通公园,成为我们课余的活动场所。

第二年小学毕业,那时上海小升初可以自由报考学校。我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加上来上海时间不长,该报哪所中学完全没有主意,由我自己选择。我想起不久前经过长安路时见到一幢崭新的三层大楼,听说是新设的长安中学。志愿表上果然有此校名,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并如愿被录取。以后与同班同学谈起,发现好几位的报考原因和我一样,被这座新楼所吸引。入学后才知道,长安中学前一年就开始招生,第一届学生是借用十三中学(后改名共和中学)校舍上课的,所以我们是第二届,进校时已经有了初二年级。十三中学出了乒乓球国手李富荣,初二同学也引为自豪。校舍是新的,课桌椅、教具都是新的,宽敞明亮的教室与弄堂小学的民房简直有天壤之别。在马路对面还有一个运动场,每年的运动会也不必另找场地。很多老师也是新的,很年轻,如我们的班主任崔老师就刚从大学毕业。

从江南小镇到了上海,我像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从小学进入中学,又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领到贴着照片的学生证(小学生是没有的),我最感到高兴的是从此可以进上海图书馆了。不久的一个星期天,我就凭这张学生证走进了这座向往已久的大楼,在阅览室读到了以前只知书名的书。在那里,我第一次翻着《唐诗三百首》读唐诗;第一次拿到《古文观止》读《滕王阁序》全文,找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出处。我借《三国志》时,拿到索书单的工作人员问:“小朋友,你是要《三国演义》吧!”我回答:“没错,我要《三国志》。”为了怕他再问,又补充:“我要看历史书,不是要看小说。”

我从小喜欢画画,因为没有人教,又没有钱买图画纸和颜料,只能利用废纸或课本、作业本的空白处乱涂。那时新出了不少连环画,学校附近正好有一些“小书摊”,可以一分钱一本的代价坐在那里看,也可以花两分钱租一本回家看。我没有什么零花钱,只能偶尔坐着看一本,倒是从租书回家看的同学那里借看的更多。我对《三国演义》等连环画中的古代人物、战争场面很有兴趣,经常模仿着画,一度连上课时都在偷偷画,得意的作品还传给其他同学看,居然一次也没有被老师发现。或许老师看在眼里,只是不愿打断正常的讲课。小书摊上的书以旧小说为主。初二下学期我在街道食堂吃中饭,省下些伙食费,尽其所能租了看,为了省钱,一本书都是当天看完,《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等都是那时看的。

教室后面墙上是两块大黑板,由班委负责出黑板报。班长见我爱画画,就要我一起出。我们从学校领到一种“六角粉笔”,比普通圆粉笔品种多,色彩鲜艳,很适合在黑板上作画或美化版面,我得以大显身手。后来我又学了用湿抹布打样,写空心美术字作标题,将黑板报布置得很漂亮。有时稿子不够,我就临时写几句诗填补空缺。一次全校黑板报评比,我尽了最大努力,老师同学都说好。评比那天,一位老师看后却提了意见:“出得很好,可惜这首诗是抄来的,否则就可以评一等奖了。”我连忙说:“不是抄来的,是我写的。”这首诗是歌颂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开始两句是:“这是什么声音?惊醒了宇宙的寂静。”老师不相信,指着“宇宙”两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作了一番解释,又背诵一遍,使他确信我是作者。结果我们班的黑板报被评为全校一等奖,我被少先队大队部聘为宣传干事,为大队出黑板报,还经常有机会参加大队干部的活动。学校组织教师参观新建的“闵行一条街”,我作为大队干部的扩大对象也参加了。在汽车上与老师们同席而坐,中午在闵行老街上一家餐馆与老师们同桌吃饭,认识了任课教师以外的老师。语文教师赵仅一见我书包中带着一

本《楚辞选》，惊奇地问我是否看得懂，我告诉他通过注释大致看懂了，带在身边是为了有空时随时可以背诵。如果借不到书，我就将要背的古文诗词抄在纸上，带在身边随时背，《蜀道难》《梦回天姥吟留别》《滕王阁序》等就是这样背出来的。他听了很高兴，说以后要借什么书，他可以帮我从图书馆直接借。其实此前历史教师王应麟已在帮我借书，有了赵老师的帮助就更方便了。

我的数学成绩也不错，但算不上突出。初三时学校选拔参加市、区数学竞赛，我被选上了。于是临时抱佛脚，集中做数学题，居然在区竞赛中胜出，获得参加市竞赛的资格。但在市竞赛初试就被淘汰，从此再未参加过数学竞赛。

一度我爱上了制作航模，经常到南京路的翼飞航模店去看。但我连那里最便宜的一套航模器材也买不起，只是去开开眼界。到了初三，学校成立航模队，我第一批报名参加，很多课余时间都在学做航模，还经常去参观航模比赛。在“大跃进”的鼓舞下，我们要求直接制作动力航模，学校支持，花七十多元买了一个微型汽油活塞机。我们制成了机身，安装机器却没有成功，因毕业临近，只能不了了之。

差不多同时，学校办了无线电收发报组。电影、小说中地下工作者用秘密电台收发报的神秘形象和神奇作用早就令人神往，有此机会自然不会放过。按规定，每人只能报一项，我已经参加了航模队，只能跟指导教师磨到“试学”无线电收发报的资格，但不久就成了组里的骨干，并且属于少数坚持到底的。指导教师是教物理的胡旭德老师，据说他以前在部队当过电报员。他一开始就警告我们：不要以为好玩，其实很枯燥。先学收报，他用唯一的电键连着一个蜂鸣器发报，我们不用耳机，直接听声音抄报。练抄数字码时，人坐满了一教室，到练英语字母码时已少了一半，随着他发报速度的加快，人越来越少。到学发报时，学校已经没有条件，胡老师带我们去四川路上的青年宫，那里有设施齐全的无线电收发报教室，每人有一个座位，配着电键和耳机，可以互不干扰同时练抄报和发报。我的收发报速度越练越快，胡老师说已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水平。可惜学期结束时没有等到这一项目的运动员等级考试，没有拿到这张我唯一有可能得到的体育等级证书。

“大跃进”时，学校所在的街道增加了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个活动室里放着一个全新的可调节的双杠。有次我经过，看到班里一位周同学在练习，做了一套漂亮的动作，我居然也有了兴趣，连着几天下课后都跟着他练。但因个子小，手臂无力，加上没有一点体育运动基础，练了不少时间，我也只学会了跳跃上下杠和简单的滑杠

动作。其实我的确自不量力,因为我平时连体育课成绩都不及格。幸而航模和收发报都列为“国防体育”,我这两项的成绩使毕业考试成绩单上的体育科目由不及格提升为及格。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闸北区新建了少年宫,各个课外活动班招生。我同时报了文学创作班和美术班,结果都考上了,但活动时间在每周同一个晚上。我舍不得放弃,就每周轮流参加一班。跟了一段时间,美术班要教油画,让我们准备颜料。我知道家里是买不起油画颜料的,只能退出美术班。后来听说,我的一幅习作入选“中国少年儿童绘画展”至日本展览,但我与美术的缘分至此而终。

由于专一参加文学班,我投入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文学班请的辅导老师是新伟染绸厂厂校老师孙书年先生,他渊博的知识和精辟的见解引导我渐入佳境。大概我的求知欲望和课堂上的积极回应也得到了他的赏识,他让我在课外去他家受教。他家在虹口区天水路一条弄堂里,我每周或隔周晚上去一次。他家中有不少古籍,允许我借回家看。他告诉我哪些书值得看,我看《两般秋雨庵随笔》等书就是他推荐的。他藏有一些书画、扇面,有时会取出教我欣赏。到我读高中时还给我画过一个扇面,一面是山水,另一面题着他的诗,记得最后两句是“平生足迹半天下,写入纵横画里山”。他是无锡人,是钱基博先生的外甥,当时我还不知道钱钟书的名字,记不得他是否提到过。我向孙先生问学一直继续到高中毕业。

1960年五一节,闸北区少年宫举行游园活动,请来了诗人芦芒和一位作家,我与另一位文学班同学接待芦芒。当时正流行写民歌,工农兵都能写诗歌,报纸上登的、电台里播的都是这类豪言壮语,我们就此请教芦芒,中学生如何创作革命诗歌,如何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告别前我拿出准备好的本子请他题词,他当场写了新作:“六十年代第一春,技术革命巨浪滚。党掌大舵指方向,工人阶级创乾坤。”

上面的活动都是我自己主动参加的,有的还是花很大的劲争取来的,但下面的活动就是不能不参加的政治活动,虽然我同样非常积极主动,乐此不疲。

初一时上海开展扫盲运动,我们都摊到了任务。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到附近里弄去帮助家庭妇女识字,摘掉文盲帽子。扫盲课本是市里统一发的,只要将上面的字都认识,读得出来,就达到扫盲标准。我分配到的是一位住在梅园路一条弄堂里的中年妇女、里弄干部,她只会讲苏北话,为了方便她读得出这些字,我也学着用苏

北口音读。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开始，到日常生活用词结束，每天读一页。到她们考试(抽读几页)前，学校还放了几节课，让我们有更多时间去辅导，结果我们教的对象全部摘掉文盲帽子。

初中这三年，我几乎没有在上课时间以外复习过功课，甚至大部分作业也是在其他课上偷偷做好的。我在学校小有名气，老师大多知道我，与我兴趣有关的学科老师会鼓励我学习提高，但没有人给我提出上大学或上某大学的目标，所以没有任何压力。父母只要求我好好读书，听老师话，从来不管我课外干什么，只看学期结束后发来的成绩报告单。毕业后我报考闸北区唯一的市重点中学——市北中学，也是我自己的主意。当时，我小学同学中就有人毕业后不考初中，当了学徒。初中毕业后，有的同学进了工厂，有的考了技工学校、初级师范、会计学校、护士学校，还有人被舞蹈学校、剧团招去了，还有的既没有考上学校也没有找到工作，以后去了农村农场。就是像我们这些考上高中的，也并非一定要上大学。所以无论成绩好坏，只要不违反纪律，不受处分，就感觉不到有什么压力。但我们这班同学的成绩并不差，毕业后考上市北中学的就有七人，还有一人考上交大附中。多年后返校参加活动，或遇到已退休的老师，还经常听到这样的感叹：“还是你们这一届最好！”

本文写作于 2018 年 1 月。

永远的母校

从我5岁入学到现在,50年间没有离开过学校——小学、中学、大学,读书、教书、再读书、再教书。经历最长的是现在的学校——复旦大学,22年;其次是工作过的古田中学,13年;求学的浙江湖州(原吴兴县)南浔镇浔北小学,5年;长安中学,3年;虬江路第一小学,1年。很难说哪一阶段最重要,因为它们都是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即使是最短的那一年,也使我从小镇上的小学生变成了上海的中学生。但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是市北中学这5年。

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考验。1962年5月,正在高二下学期时,我在体检中查出患了活动性肺结核。休学了一年半才复学,但原来的班组已毕业,只能转入下一届。谁知到1964年毕业前体检仍不合格,丧失了报考大学的机会。我之所以没有失去信心,能由悲观转为达观,由消极转为积极,靠的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鼓励。所以我在1964年9月就愉快地参加了师资培训,决心当一名教师。以后即使在“文革”期间,在遇到极大困难时,我也能比较泰然,坚信学了知识总有用,努力工作有前途,终于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机遇。

在此期间我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学会了自学。在初中时我的兴趣很杂,几乎样样都想学,都想试。体育运动虽不行,还是参加了航模、无线电收发报训练。进高中后才懂得了要有所侧重,这倒不是哪位老师专门教的,而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潜移默化的结果。我们班组中多数同学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追求,都在学好课程的同时发展自己的专门。我最感激的是历史、语文、英语等老师和班主任给我的一些特殊照顾,他们并不要求我得100分或5分,而是给我自学提供方便,帮我借书,允许我使用教师阅览室,使我在那时就读了一部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名著。我高中

实际只上了两年半，病休脱的课都是靠自学补上的。此后除了上过一年英语夜校外，我没有再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在1978年首批招收研究生时还能以全系最高分被复旦大学历史系录取，应该归功于母校给我打下的基础和自学习惯。

在此期间我从一名学生变为教师。从1964年9月起，我们名义上是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实际上就在母校实习，我在外语教研组实习英语教师。由学生变为“准教师”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教师与学生的双重身份使自己在原来的教师和相识的高年级同学面前常常不无尴尬，加上那时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学习与斗争之间往往不知所从。但这一年的培训还是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65年8月——我还没有满20岁起，就正式成为中学教师，当班主任，上英语课了。35年间，我由中学到大学，由教初中生到教博士生，由班主任到研究所所长，并曾被评为市先进教师，但我的出身始终是在母校的这一年培训。

或许我的情况有些特殊，但每次与老同学相聚，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倍感亲切。

80年代以来，我多次返校，起初是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母校依旧，而自己熟悉的教师大多陆续退休，有的已经离开人世。这几年母校旧貌变新颜，但留下的老师更少，已是物新人新了。但每当我看到市北中学这个名字，想到我在市北度过的五年，记起当年的老师同学，心中的母校丝毫没有改变。

市北，我永远的母校，愿您永远！

本文写作于2000年10月8日，时近母校八十五周年校庆。

通古今之变的南浔

与其他江南水乡的古镇一样,你可以在南浔看到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找到千年的古桥、百年的老屋,听到不少在史书上提到的名字。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充分领略传统的同时,你还能品味时尚——20世纪初叶的时尚。

小莲庄是南浔豪富“四象”(四家最大富豪的俗称)之首刘镛祖孙三代所建,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历时四十年才完工,是镇上保存最完整的私家园林。广约十亩的池荷塘四周,环绕着长廊曲桥、亭榭楼阁,比起苏州名园来毫不逊色。仔细观赏,却见飞檐斗拱、花墙漏窗连着一幢小洋房,而这种中西合璧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以至常常被游人忽略。在江南名园中,小莲庄的历史并不长,却能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显然也考虑了这一特色。

步入毗邻的嘉业堂,发现这座建成于1924年的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并不是一件古董,而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现代化的藏书楼,不仅设计和管理的观念很新,根据藏书的特殊需要在形制上作了变通,还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建材——进口马口铁(俗称洋铁皮)和铸铁构件。楼主刘承干虽以前清遗老自居,处世却相当现实,日占期间一方面利用“满洲国皇帝”溥仪题字的匾额当书楼的护身符,一方面却已将大批珍本秘籍让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主动捐出财产图书,既保全了藏书楼,也使自己能安享晚年。中国近代的藏书楼中,嘉业堂是最晚建的,但一度最辉煌,归宿最圆满,留下的建筑、设施、图书最完整,如今也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宝。

不远处的懿德堂是同为“四象”之一张氏长孙张石铭的住宅,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建于晚清的巨宅占地5135平方米,建筑面积达6137平方米,有大小244个房间,因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外贸茶叶仓库占用而得以完整保存。跨过一

道道高门槛，穿过一进进厅堂和院落，精美的石雕、砖雕、木雕、奇石、匾额、门楼令人目不暇接。从第三进起，内厅两侧的漏明廊窗都雕刻成芭蕉状，当年院墙旁还遍植芭蕉，是名副其实的芭蕉厅。更使人啧啧称奇的是，楼窗上都镶嵌着法国进口的菱形刻花蓝晶玻璃，刻有各式花果图案，格外高雅别致，也显示了张家与法国的交流渊源。

进入第四进，但见大厅地面铺着、墙上嵌着法国进口的彩色瓷砖，是一个带化妆室和衣帽间的豪华舞厅。在铺着青砖的小院对面，竟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两层小楼，花岗石台阶、巴洛克立柱、半圆阳台、楼花铁栏、克林斯铁柱头、百叶窗、刻花蓝晶玻璃、清水红砖墙，法式时尚和生活方式早在 20 世纪初就为张氏年轻一代所钟爱，只是深深地掩盖在两棵高大的玉兰树下，又被四周高墙所隐藏。我幼时从墙外经过多少次，却从来不知道这座大房子与镇上其他宅子有什么不同。

出懿德堂沿河北行，有今天的南浔镇史馆。即使不看陈列的内容，这座建筑本身就是南浔近代史的重要部分——建成于 1925 年的商会。南浔镇商会成立于 1921 年，附设于丝业会馆，首任会长是“八牛”（仅次于“四象”的八家富豪）之一梅氏第三代梅履中，继任的是“四象”之一庞氏第二代族人庞赞臣。集资 6 万银圆建成的商会建筑，在江南集镇同类建筑中最为宏伟，今天漫步其中还能感受到这种气派。

河东的丝业会馆后被改作小学，建筑虽比不上商会，但当初也有过一段辉煌。这不仅是因为南浔所产“辑里湖丝”名闻遐迩，更由于它见证了南浔丝业的外向发展和国际交流。1920 年，丝业同行组团赴美国纽约参加第一次万国丝绸博览会，1923 年和 1925 年分别接待了美国丝商参观团，使辑里丝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和世界知名品牌。我国首次参展世界博览会并获奖的“荣记湖丝”，虽由广东籍商人提供，但也产于南浔。

近年整修复原的“红房子”是亲沐西风的刘镛第三子梯青所建。这座几乎“全盘西化”的两层建筑能出现在近百年前，正映射出这座千年古镇的时尚追求。幼时我在镇上还看到过一些“洋房”，都是 20 世纪前期的产物。在我的记忆中，不仅有适园、庞家花园（宜园）、百间楼屋、土地堂、分水墩，还有与西风东渐和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一些名词——耶稣堂、洋龙会（救火会）、电灯厂、蚕种场、丝厂、育婴堂、女子学堂等，它们都曾是当年南浔的时髦，如果能够一一寻访，则所见所闻正是一部江南市镇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历史。

鸦片战争后清朝被迫实行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新兴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很快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导致江南传统手工业和商业萎缩,江南的市镇也因此日趋衰落。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绝大多数江南市镇的残破,南浔也未能幸免。但南浔的商人敏锐地认清潮流,纷纷将资本转往上海,开店设厂,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并直接经营外贸,有的还远渡重洋,去法国、美国经商。土丝商转变为“丝通事”和洋行买办,一大批南浔人成为上海的新移民,南浔的经济发展也与上海的兴盛连接在一起。

南浔不愧有凝聚了千年的文明,趋时和西化并没有改变它厚重的文化传统。即使从今天的遗存也可以看出,两者结合得相当和谐,南浔并没有因为西式建筑的出现和西风的浸润而受到破坏,却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特色。在南浔豪门富户的“四象八牛七十二条蛟黄狗”中,既有巨商大贾、民国元老、党国要人,也有名动海内的学者、书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他们的后人中还产生了新中国的科学家(包括“两弹一箭”元勋)、院士、经济学家、诗人、作家、大学校长、部长。在聚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南浔一度拥有大批价值连城的古籍、书画、金石,在全国城镇中罕有其匹,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上海博物馆的珍品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善本。

这就是南浔历千年而常新的奥秘,也是南浔的魅力所在。

本文写作于2003年11月。

童年生活中的江南“粪土”

李伯重教授《粪土与历代王朝兴衰的关系》一文中有关江南“粪土”的叙述勾起了我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也可印证伯重兄所引的史料。

1945 年我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宝善街，1956 年夏迁居上海。因我幼时记忆力颇强，加上一个衰落中的市镇没有什么宏大题材，日常生活反能留下较深印象。

从近年发现的《南浔研究》（当时小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形成的社会调查资料）原稿得知，上世纪 30 年代镇上已有几处公共厕所，但到 50 年代初每家每户还都使用马桶，倒马桶便成了家庭主妇或女佣的日常家务。不过，家里的女人不必亲自倒马桶，至多只要将马桶拎到家门口，因为每家的马桶早已由惜粪如金的农户承包了。每天清晨，都会由固定的农妇或她家的大女孩将马桶拎去，倒入她家的粪桶后再洗刷干净，送回原处。如果主人不介意，也可不必将马桶拎出，由她直接到房间取。但送回时都送在门口，还将盖子斜放，开着一半，一则告诉主人马桶已倒过，一则便于风吹干洗刷时弄湿的马桶沿，免得主人使用时不舒服。到 80 年代我第一次在广东的餐馆用餐，见友人将茶壶盖打开一半斜放在壶上，得知这是提醒服务员添水，不禁想起那时家门口斜放着盖子的马桶，差一点笑出声来。

也有讲究的主妇嫌乡下人洗得不干净，会自己拎到河边，用专用的马桶刷子再刷洗一遍。这种刷子一尺多长，用竹子劈成细条扎成，南浔方言称之为“马桶甩（音 hua）洗”。如果主妇抱怨，农妇会忙不迭地赔不是，保证明天一定洗刷得更干净，因为怕失去一个粪源。我家自然也备有马桶甩洗，但母亲用的次数不多。南浔人在指责别人或自己孩子满口脏话时，会骂一句重话：“嘴巴要拿马桶甩洗刷刷了！”

对农家来说，粪源就是肥源、财源，特别是承包马桶，更是固定的日常粪源，必须确保。按惯例，四时八节，农户都要给马桶主人家送时鲜蔬菜和自制食品，过年前送得更多，一般有新米、糯米、鸡蛋、鸡、肉等。农户自给自足，送的东西都是自己种的或自家地上长的。如有的农家有片竹子，会送春笋冬笋；有的农民会捕鱼抓虾，会送鱼虾。自制食品一般会有薰豆（毛豆煮熟后在炭火上烘干）、风消（糯米饭摊在烧热的铁锅上用铲子压成薄片烘干）、年糕、粽子、炒米粉等。礼物的多寡虽与农户的能力及双方的亲疏程度有关，主要还取决于粪源的数量和质量：人口多的人家不止一个马桶，量大；成年男性多，马桶中粪的含量高。以承包马桶为基础，双方往往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农户为巩固粪源，防止他人争夺，会尽力讨好主人。主人也会有求于农户，如家里有婚丧喜事要采购食品，到乡下上坟时找个歇脚地，孩子要雇奶妈或寄养，临时找个佣人或短工，出门搭个航船，都得找熟悉的乡下人帮忙。而来家倒马桶的人天天见面，联系方便，又信得过，往往认了干亲，相互以“干娘”“过房女儿”相称，结成比一般亲戚还密切的关系。

当地习俗，男人除了使用外不能接触马桶，否则于本人及家庭都不吉利，拎马桶、倒马桶、洗马桶都是双方女人的事。承包马桶的农户一般离镇不远，都用粪桶将收集到的粪便挑回去，集中在自家的粪缸中。大多是由女人将空粪桶挑到承包户附近较隐蔽处，倒完马桶后由家里男人来将粪担挑走，也有女人自己挑回去的。有的农户承包的马桶多，或者路远，会搭航船回家，将装满粪便的粪桶挑到船上，放在后梢。为了不招致镇上人讨厌，倒马桶的人一般都起得很早，挑粪的人也尽量走偏僻的小路或弄堂。偶然见到直接将粪便装在船舱里的粪船，那是运公共厕所或学校等单位里厕所的，当然也需要预先订购。

不过到我离开南浔前一两年，镇上有了“清管所”（清洁管理所的简称），并且出现了由清管所工人推着的统一式样的粪车，上门倒马桶的农妇消失了，居民自己将马桶倒入粪车或新建的公共厕所内。我父母在1954年就去上海谋生，我们姐弟虽还住在家里，却是由外婆来照料的，我已记不得来我家倒马桶的人什么时候开始不来了。现在想来，这大概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粪源归集体了，农户自然不能再个别承包倒马桶。种田开始用“肥田粉”（化肥），粪肥独秀的格局改变了。

1956年我也到了上海，随父母住在闸北棚户区的一个小阁楼上。每天早上都会听到马桶车轧过弹硌路的声音，大弄堂里会传来“马桶拎出来”的喊声，母亲会随

着邻居将马桶拎出来倒入粪车,然后在给水站(公用自来水龙头)旁洗刷马桶。有人在马桶中放一些毛蚶壳以便刷得更干净,于是传来特别响亮的刷马桶声。1957年我家搬到共和新路141弄,住在弄堂底,马桶车进不来,后来建的倒粪便站也在弄堂口,加上母亲早上要上班,只能将倒马桶包给一位大家称为“大舅妈”的中年妇女,每月付费1元。一次母亲与南浔的亲戚谈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家里的马桶给她倒,非但得不到好处,还要倒贴钱,“难道收粪的不给她好处?上海人真门槛精!”

在南浔时,亲友和同学中没有大户人家,住房都不大,大多没有“马桶间”,马桶就放在卧室一角或蚊帐后面。我们从小被教的规矩是,到别人家里去时不要喝茶,尽量不要用马桶,特别是女孩子。只有过年可以例外,因为南浔过年待客时要上甜茶(放风消和糖)、咸茶(放薰豆、丁香萝卜干和芝麻),不喝是失礼的。有时小孩喝不完,大人会帮他喝光。但到乡下去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因为农家都欢迎使用家里的马桶,送肥上门。不用说亲友上门,就是路过的陌生人,无论男女老幼,只要说是“借你家解个手”,或“急煞了”,主人马上会将其延至马桶前。有的农妇还会热情介绍:“这只马桶刚刚刷得清清爽爽”,“汰手水搭你放好了”。草纸当然会放在马桶旁。如果主人家正好有空,还会泡上茶留来客休息一会儿。如来客喝了茶,又及时转化为小便,那就上上大吉,主人一定会更热情地招待。就算家中没有人,只要门没有关上,过路人也可以堂而皇之进屋使用马桶,主人回来绝不会怪罪。

为了广开粪源,乡村的路旁不时可见掩埋着的大粪缸,缸口高于地面,缸缘铺上一块木板,供过路人蹲在上面方便。有的还在上面盖上简易的稻草顶,为使用者遮阳挡雨;木板前方横一根竹木把手,以减轻使用者久蹲的疲劳,并便于结束后起立。但这类简易厕所总不会全部封闭,大多全无遮挡,使用者在内急时也顾不得那么多,所以我们在乡间行走时,会不时从蹲客后面看到半个屁股,或者见到撅起的屁股正在完成最后的动作,早已见怪不怪。我们男孩小便时自然不愿站到粪缸上闻臭,就随便在路边田头找个地方。要是给农妇看见,一定立即制止,并热情邀请:“小把戏,乖,到这里来撒!”或者说:“我这里有豆,撒好后拿一把吃吃。”如果有自己的孩子与我们在一起,必定招来怒骂:“个青头硬鬼(音举),笨得勿转弯,还勿快点叫两个小把戏撒在自己田里!”

路旁随处可见的大粪缸固然是农家上好肥源,可换来满仓粮食,但也给路人与乡村本身带来很大麻烦。一是臭气熏天,因为粪缸都是敞开的,最多在上面盖一层

稻草。特别是夏天,在骄阳下粪缸中的水分与臭气一起蒸腾,掩鼻而过也受不了。一是不安全,走夜路的人不小心跌入粪缸的事时有发生。暴雨后粪水横流,农民在河里洗粪桶,造成河水污染,而农民为节省柴草,夏天一般都喝生水,用冷水淘饭。粪缸上苍蝇成堆,农民家中也满桌满灶。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习惯使得传染病易于流传,病人又得不到及时防治,常有农民不明不白“生瘟病”死掉。幼时常看到一群人抬着病人从乡下赶往医院,有时跟着去看热闹,不久就听到哭声震天,抬出来的已是一具尸体。

到上海后常在暑假回南浔,再到乡下走走,见露天粪缸逐渐消失,代之以公共厕所。镇上居民用上了自来水,有了集中处理粪便的水冲厕所,已有人家用抽水马桶。尽管镇上人家的马桶还沿用了很久,但农户承包倒马桶从此成为历史陈迹,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还保留在记忆之中。

原载腾讯网《大家》专栏,2016年3月22日。

■ 青春无奈

我在市北的不幸与大幸

我和大家一起于1960年9月考进市北中学，但直到1964年7月才毕业离校。从当年9月起我又作为上海市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的学员分配到市北实习，至1965年7月期满，前后共有五年时间。

我在市北经历了人生中一大不幸——在1962年5月一次体检中查出我患了浸润型肺结核，医嘱立即休学三个月。本以为到9月开学时可以复学，岂料病情依旧，一次次复查，一次次三个月的病休。眼看回原班无望，只能作转入下一年级的打算，谁知1963年8月拿到的复查报告上还是病休三个月。由于市北实行学制改革，这是三年制高中的最后一届，如果再不能复学，就必须转学，因此我先向医生力争，终于在11月拿到了可以复学的证明，又向学校争取到试读高三（因我高二的课还差两个月和大考成绩），转入64级的5班。但更大的打击发生在1964年5月，毕业体检的结论是我的肺病尚未痊愈，不符合参加高考的条件。

我在进高中后就确定了高考志愿，选定的目标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阅读文史古籍，以文言文写作，参加青年宫举办的书法班，向校外的老师求教，尝试编纂历史工具书。原本信心十足，志在必得，结果却连进考场的资格也没有。

遭遇如此不幸而有今天，我得感谢命运的另一面——我在市北的大幸。

我遇到了一批尽责、高明而体贴学生的老师。

班主任瞿佩荃老师一心一意督促学生努力学习，午间也经常到教室里来，见到同学们在做作业、看书就笑逐颜开。但一见有同学在打牌就面露不悦，委婉而坚定地劝阻：“中午玩玩也不是不可以，不过，其他同学都在做功课，你们打牌会影响他们

的。”她是教化学的,但对我这个化学成绩一般的学生在其他方面的努力,同样格外关心。她在得知学校图书馆中找不到我需要查的书籍后,主动帮我向她的父亲——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咨询。

语文老师陈砚田、田楚明对我关心备至。当时校图书馆只办理学生的集体借阅,有些书只供教师使用,阅览室也只对教师开放,但田老师以她的名义帮我借书,以后又与历史老师毛仁村老师一起为我争取到使用阅览室和外借教师用书的特权。《资治通鉴》、前四史及一些文学古籍就是我在市北期间利用这样的特权借出来通读的。我在病休期间,白天经常是在阅览室中度过的,以至与有的青年教师成了过从密切的朋友。

毛仁村老师不仅为我课外阅读开方便之门,而且允许我在历史课做其他作业,看其他书,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她说:“课上讲的内容你不必学了,只要参加考试就可以。”有一次我与同桌的金宗伟一直在小声讲话,不知不觉声音响了,她走到我桌旁,俯身附在我耳旁说:“轻点。”

英语老师赵汉文见我对英语有兴趣,给了我不少机会,让我在班上教唱英语歌曲,参加课余英语兴趣组。记得是由金峰老师辅导,用的是灵格风情景对话教材。还排了英语短剧《东郭先生和狼》(*Master Dongguo and the Wolf*),由我演东郭先生,蔡端演狼。后来蔡端请病假,没有排下去。我的英语是高一时从 abc 学起的,以前从未接触过,家中也没有任何人懂英语,但由于赵老师给我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在病休期间自学了高三教材。我复学后到新班级不久,就是英语期中考试,试卷发下后几分钟我就交了卷,同学们都以为我这个插班生交了白卷。知道底细的姚洵闻老师却笑着说:“为什么不再看看?不想拿满分吗?”1965 年,我到古田中学工作后报考上海外语学院夜校部,直接分入二年级,而多数教育学院英语专语毕业的青年教师分在了一年级。

市北期间的政治活动、学习、下厂劳动等要求严格,但我们并不感到有什么压力,反而学得很轻松。每当大考前停课复习,满足自己兴趣的机会来了,我照例是在上海图书馆、博物馆、福州路的各个书店中度过的,根本没有专门复习过,但数理化等课我也能得 4 分。我英语学得很好,却从来没有得过满分,老师也没有这样要求我。

当得知我仍不能报考大学时,沮丧之余我还是在家自学等待机会。此时班主任

余邦贻老师劝我报名上海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班,他说:“当社会青年会把自己毁了,还不如先工作,今后还会有上大学的机会。”我本想选教语文,他却劝我选英语:“你英语基础好,教起来很轻松,会有更多自学时间。教语文每周要批两个班级的作文,工作量很大。”

后来,我前后两个班级的同学在“文革”期间大多被分配到外地、农场、部队,经历了诸多磨难,我却一直留在上海当中学教师,有一份工资,“文革”中也能以“支援世界革命”“批林批孔”“评法反儒”的名义学英语,看古籍,看内部书,还能为同学们联络、聚会提供条件,实在是因祸得福。

“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被评为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能当上一个还算称职的教师,还是在市北期间老师们言传身教的结果。同年底作为闸北区中学教师的代表,我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恢复高考时,我去报名,因超龄未被允许。不久开招研究生,强调“不拘一格”,学历、年龄均无限制,我无知无畏,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居然为全系第一、全校前列。1983年9月,我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全国文科首批二人之一。饮水思源,我立即给母校写了一封信,表达我对老师们的衷心感谢。

这场肺病也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开始重视体育和健身,1967年学会游泳,坚持至今,保持着一次能游1600米的水准。得益于此,我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到过国内各省区市(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七大洲数十个国家,包括南极、北极、西藏阿里、撒哈拉沙漠、东非大裂谷、兴都库什山、开伯尔山口等地,还在海拔四五千米处露营骑过马。

我们都有幸在进入中年前遇到了改革开放,我大概属最幸运的一批。这三十多年的人生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在市北期间的梦想,但我永远不会忘记,使我遇到的不幸能转化为大幸的,是市北中学的老师们。

本文写作于2015年7月,原载内部资料集《人生从市北起步——六十年代校友市北中学百年校庆征文集》。

偶涉经典亦受益无穷

幼时家贫，连学费都经常交不出，哪来钱买书？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很喜爱古典诗词，偶然在哪里看到，不管是其他人的课本，还是旧书、报纸，我都会多读几遍。那时记性不错，有时一首诗词就背下来了，至少能将其中我认为好的句子记住。不过，那些诗词是什么意思，往往连一知半解都没有。后来得到一本已经散了架的石印本《唐诗三百首》，这成了我的常用课本。时间久了，除了几首长的古风外，其他的诗大多读熟了，内容也大致明白了，或者猜出来了。我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些诗用我家乡浙江吴兴县南浔镇的方言念基本押韵，用上海话读稍差些，而用普通话读就不一定押韵。初中时在工厂劳动，一位老职员与我闲聊，不知怎么谈到了古诗用方言念才押韵。他问我什么原因，我说大概是因为诗人是南方人吧？他反问：“那么要是诗人是北方人呢？”我不知所以然，就说：“说不定古时候人讲话都与今天南方人差不多。”他说，以前有专门讲诗词格律的书，也有专门查韵目的书，可以找来看看。

到读高中时，口袋里偶尔会有几毛钱，我就到书店去看看。有一次，我发现有一本小册子《诗词格律》，是王力所著。那时已知道王力是大学者，就毫不犹豫地买了。高二时病休了一年半，这本小册子翻来覆去不知看过多少遍，内容已相当熟悉。知道王力还有更专门的《汉语诗律学》和《汉语音韵学》，但那是绝对买不起的，图书馆也借不到，真是可望而不可即。1964年9月，我被安排到教育学院的师资培训班，每月有二十几元助学金。拿到第一笔钱后，我就到宝山路新华书店买了王力的《古代汉语》，但买不到《汉语诗律学》。过了两天，我专门去了一次福州路，在古籍书店中买到了。《汉语诗律学》其实我也没有全看懂，读过这本书后，再读古诗，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标准。不到一年，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产阶级

思想持续不断,吓得我不敢再看这些书。到了“文革”时期,放在学校的《汉语诗律学》等书不知所终,只有《诗词格律》等小册子幸存下来。

从那时开始,我再也没有认真读过古典诗词,全部有关的记忆和知识,都是之前积累下来的,那本《诗词格律》和《汉语诗律学》实在使我获益匪浅,尽管我连一知半解都够不上。

最近我又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新书目中见到这本书,并且还有其他早就向往却没有机会读的书。要是当初就能读到这些书该有多好!一定会像读《汉语诗律学》一样有收获。来者可追,我愿将它们推荐给年轻的朋友。

本文写作于2002年5月。

时代性的人性扭曲

——特殊年代中的双重人格现象

三十多年过去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不一定能记清楚自己是怎样度过这十年的了。但有一点肯定不会忘记,无论他曾经是红卫兵、造反派、工宣队(“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还是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称)、保守派、逍遥派,无论是烜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被批倒斗臭的“牛鬼蛇神”,谁也没有未说过假话,或者未做过违心的事。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几乎人人都要说自己愿意或不愿意说的假话,做自己想做或不想做的违心事,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这却是中国 20 世纪一个时期的现实,正视这一现象,记取由此引发的教训,是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时代性的人性扭曲

首先,应该承认,很多今天看来是地地道道的假话,当年绝大多数人是当作真话来说的;很多今天看来是愚不可及的蠢事、害人害己的错事,当年大家却是当作好事来做的。在“文革”前期尤其如此。对自己所不理解的、闻所未闻或者肯定是错误的事情,一般都认为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结果,甚至认为只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偏见。

如果说以往的运动多少还有一定的范围,还有一定的思想色彩的话,“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可以说是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整个中国已经很难有世外桃源了。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社会团体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伤害或打击,实际上,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自由地存在于运动之外。可是亿万人却如醉如痴,以疯狂的热情投身于这

场“大革命”。我有一位在中学当教师的朋友，在运动一开始就被学校党支部定为“左派”，参加“核心组”^①，参与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但几天后，他被一批反对党支部的学生作为“黑帮”揪出。于是他白天和自己揪出的“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改造，接受批斗和打骂，晚上却和核心组成员一起商议明天如何批斗“牛鬼蛇神”（实际上少不了他自己），如何将运动引向深入。尽管其他人未必像他这样典型，但集“革命的动力”与“革命的对象”于一身却是普遍现象。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人都在扮演着双重角色，具有双重人格。

双重人格并不是“文革”的产物，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双重人格也不是中国的特产，西方、东方哪一个国家都不能说没有。但普及到如此程度，却非中国的“文革”时期莫属。

儒家的修身养性，本来是为了激发和培植正常的人性，限制和克服非人性、动物性。这一过程虽然不无困难和痛苦，但多数人能够接受。目标虽然高尚，要求虽然严格，也没有离开人的基本需求。但以后要求越提越高，完全脱离了人性，就成了虚伪的教条。如果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当然可以不理睬这些教条，保持自己的天性。不幸的是，当儒家理论特别是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成为钦定的行动规范之后，人性就不再有合法存在的余地，人们不得不接受实际上根本做不到的标准作为行动的准则，以虚伪、作假来应付外界的压力。例如，孝本是人类的天性，尊老敬亲自然是一种美德。但儒家提倡的孝道逐渐演变出种种不近人情的残酷规定，甚至强迫人们像“二十四孝”那样作出毫无意义的牺牲。在无法公开反对这种孝道的情况下，形形色色的假孝行为、假孝言论应运而生，所以在孝的方面也出现了双重人格，一方面是对亲人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则是对礼教的应付。真正孝父母的行为往往会违背“孝道”，而对父母虚待的人却能把孝的礼教表演得有声有色。

在错误路线的引导下，本来正确的理论和口号在中国越来越走向片面和极端，成为脱离实际、违背人性的空洞口号和深奥莫测的教条。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路线、方针、政策当然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不能为民众所理解。但只要打出革命的旗号，假借出自党的领袖之口，它们就会取得绝对正确的地位，“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常识和良心又使人们不能不产生疑问，在执

^① 上海的中学在“文革”初一般都成立由党支部书记领导的“核心组”，成员包括学校党、政、工、团负责人和被确定为“左派”的教师。该组一般每天开会，分析动态，贯彻支部的意图。随着运动的进展，其成员不断调整变化。

行中也免不了会有所犹豫,结果只能说假话,做违心事。同样,根据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树立或培养起来的“样板”,对一般人来说都已是高不可攀的偶像。他们的行为不但无法叫人学习,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忠不忠,看行动”,学不学是要不要革命的具体表现,于是只能无休止地“斗私(心)批修(正主义)”,直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不断地说着批判自己的假话,重复着一个接着一个的学习、批判、斗争的运动。

泛政治化的是非标准

其次,是将政治标准和阶级分析绝对化和无限扩大。政治扩展到一切领域,成为判别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世间万物只剩下革命与反革命两种类型。个人的判断能力和思想感情不仅必须完全服从政治,还得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转变。议论苏联红军在东北掠夺物资就是“反苏”,够得上定为右派分子,因为那时政治上要“一边倒”,苏联是“老大哥”。到了反修斗争时,谁要说苏联或苏联专家的好话就成了“美化苏修”,也是不小的罪名。当林彪出任“副统帅”时,谁要说他尊容欠佳,怀疑他体弱有病,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一旦林彪出了事,连平型关战役的评价也成了问题。阶级性完全取代了人性,同样一件事,对不同的阶级就一定要作不同的价值判断。无产阶级讲卫生是爱国,资产阶级爱清洁就是腐朽的生活方式。贫农的儿子学习努力是为革命而学,地主的女儿成绩优秀肯定是出于复辟目的,是地主阶级企图利用文化来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既然对一切事物都要用阶级分析,阶级敌人自然就不会有人性,也必定会搞破坏活动,所以凶恶的地主是“黄世仁”,和善的地主就是“笑面虎”,并且更有欺骗性。“阶级敌人”劳动不认真自然是对抗,干得卖力也必定是在制造假象,伺机反扑;要是自杀了,就更是负隅顽抗,死不改悔,自绝于人民。按照这样的逻辑,一个人只要成了“阶级敌人”,就不可能有任何优点和长处,就得与他彻底划清界限,即使是夫妻、父子、师生、上下级、朋友。这样的政治标准和阶级分析,不用说小民百姓,就是高层官员也是无法掌握的,只要稍有人性就会划不清界线,非得具备双重人格不可。

被封杀的信息传媒

再者,是对信息的严格控制和对外部世界的片面宣传,致使人们完全不了解真

相,不可能识破假话,反而虔诚地信奉假话,相信谎话。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世界人民如何拥护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何与本国的“帝修反”作斗争,自然更增添了几分狂热。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听过一个形势报告传达,那位市里的领导干部在报告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个苏联歌舞团到某食品厂参观,一走进生产午餐肉罐头的车间,人人都做深呼吸,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肉了。工厂送给他们肉罐头,团长以“歌唱演员不宜多吃脂肪”为由予以谢绝,这时有团员报告说:“我是吹号的,没有关系。”我们听后立即感到极大的满足和自豪:我们虽然有困难,每个月还能配给几两肉,而苏修国内却连肉味道也闻不到,社会主义与修正主义究竟谁胜谁负不是很清楚吗?

上海一位经常接待外宾的老太太在回答瑞典客人的问题时,可谓活学活用。瑞典人问她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如何,她毫不犹豫地回答:“还不是和你们现在一样嘛!”客人闻言大吃一惊,想不到中国劳动人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陪同的领导自然十分尴尬,对这位基层干部大为恼火。对客人的困惑和领导的不满,老太太却理直气壮:“你们不是说客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是属于还没有得到解放的‘三分之二’吗?”她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说了假话或谎话。

“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

自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理论出现后,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说真话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了。尽管这一理论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但在实际运用时却成了隐瞒真相、文过饰非、混淆是非、随心所欲的手段。即使是省长、部长,能够听到见到的都只是“一个指头”,不可能是“九个指头”,知道得再多也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更不用说一般干部和普通百姓了。在历次运动的锻炼下,大家都已学会了这简单不过的算术:对八亿人口来说,八千万人也不过是一个手指。要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人饿死,“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死了人,历次运动抓了人、斗了人、枪毙了人,难道会超过八千万吗?岂不是“一个指头”而已?永远不会是本质问题。

更何况典型和样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随时可以用来证明“九个指头”的存在,

尽管这类典型和样板的调查材料按惯例是不会有数量分析的,却可以用来代表本质。万一有人提出数量太少,也只是暴露他们自己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因为新生事物一开始总是少数,本质的东西不一定有数量上的多数,真理有时在少数人的手里。你说粮食亩产不可能有一万斤,报上明明登着某地产量已破十万斤,不但有照片为证,还有科学家的论证。你说“文化大革命”影响了生产,卫星上天、氢弹爆炸、长江大桥通车难道是假的吗?你说学生不读书,质量太低,请看几个优秀学生的水平,证明现在学生的质量早已超过了“文革”以前的17年。意大利摄影家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尽管都是实录,但还是暴露了他的反动立场:为什么放着中国制造的万吨巨轮不拍,却要拍黄浦江中的小木船呢?为什么对我们已经准备好的典型人物不感兴趣,却非要自己选择拍摄对象呢?

不过,想要转变立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你要知道“九个手指”的真相,要理解“本质”究竟是什么,唯一的来源就是官方的数字,而这些数字或者根本没有,或者与事实有惊人的差距。我曾经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亲眼看到安徽饥民不顾一切地将抢来的大饼、油条塞进嘴里,但被告知他们都是不接受改造的地主。我从亲戚和教师那里得知安徽饿死了不少人,却断定这只是“一个手指”。直到80年代初参加撰写《中国人口》丛书,才从国家统计局获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1800万。

正因为如此,人们经常怀疑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为什么不像劳动人民那样自觉地讴歌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却会和阶级敌人一样与新生事物格格不入,指责革命事业这也不行、那也不是?由此得到的教训只能是: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是“一个指头”和“现象”,都不能当真,而自己无法看到的才是“九个指头”,是“本质”。例如,林彪的病态只是“现象”,是“一个指头”,他身体健康并且永远健康才是“本质”,是“九个指头”,因为当时宣称:据医生彻底检查,他全身的器官没有任何毛病,预计能活过一百岁。这样的“本质”和“九个指头”,除了有资格宣布这个“特大喜讯”的人以外,一般人就是无产阶级觉悟再高也是永远看不到的,自然只有深信不疑的份了。如果再有丝毫怀疑,必定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以至立场不稳的表现。

不要以为笔者的精神不正常,这正是当年自我检查的模式,也是批判别人的手段。

无法无天的社会运转体系

到了欺骗和诡辩都无济于事时,要使人们自觉地说假话,保持双重人格,就只能依靠暴力的镇压,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被打击的对象数量迅速增加。政策急剧变换,新旧矛盾暴露,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以后,人们的信念已经大大动摇。到了“文革”后期,大概很少有人完全说真话了。“两个人说真话,三个人说假话,四个人说笑话”的民谣,生动地说明了不同场合下说话的性质。所不同的是,以往是不自觉地说,是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假话;此时则是明知假话而说之,自觉地说好假话。原因也很简单,“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已经无所不在,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用了。

早在50年代,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开了公布私人信件的恶例。到了“文革”期间,个人隐私已荡然无存。书信、日记自然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就是“臭老婆”“狗崽子”在严刑逼供和“划清界线”的诱惑下作的“揭发”也是百分之百的定案证据。说真话的空间既然近乎消失,不说假话又怎么能生存?

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已被取消,假话说得不到位就有“假革命”之嫌,不说假话自然与反革命无异。反右运动中出现一声不响的右派、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的右派,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平时规规矩矩做事、遇事谨小慎微、能不说话就不说话的人,在“文革”中完全可能被当成隐蔽得巧妙、埋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来“深挖细查”。何况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深入街道、家庭、穷乡僻壤、闲散人员群体、教堂寺庙、少数民族地区、港澳地区、驻外机构等,要寻找能够保持沉默的场所谈何容易?

“文革”期间,甚至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谁都知道,自杀就是“自绝于人民”“叛党”,就是“死不改悔”“顽抗到底”,不仅再也没有翻案或昭雪的机会,还会祸延家属子孙。我问过一些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的老知识分子,是否动过自杀的念头,不少人的回答是想自杀而不敢。一位全家都受到隔离或批斗的教师说,当时他们相互传递的信息就是千万别自杀。这就是青年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弟弟(父亲早已入狱)一起开煤气自杀的惨剧的根源——他们只能选择全家一起死,才不至于连累家里其他人。

如果说对刑事犯的惩处多少还有点尺度的话,那么对言论和思想犯的打击就完全可以随心所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今天只是批斗了事的人,明天可能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次次的案例讨论和一批批“现行反革命”的处决,自然吓得人们用他们的“罪行”来检点自己的言行。

双重人格的普遍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高潮,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使“文革”流毒加深,时间延长。双重人格的悲剧意义并不限于“文革”,对中国人的毒害也不限于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过去后,人们常用“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来形容一些人的行为。长期的双重人格造成这样一种现象:即使没有任何威胁存在,他的心也会悸,并且不知道这是心悸。

我想起一个完全真实的例子:先师谭其骧先生在 80 年代中期收到他一位学生的几封来信,几乎是同一格式,这位年近七十的研究员用开头一段话歌颂党中央领导下的大好形势,用第二段话歌颂社(九三学社,谭先生和他都是九三学社成员)中央的正确领导,第三段话是赞扬在老师领导下科研项目取得的成绩,再表明自己积极参加的态度,信写了一半以上才转入正题,最后还免不了几句套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位正在抱病工作的非常严谨而踏实的学者,谭先生是他四十年来的老师,当时对他并不存在什么政治上的压力。

三十多年了,我们告别双重人格的时代了吗?

本文写作于 1996 年 5 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三十周年将到时。

殉葬品和掘墓人：“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

20年前，为了纪念“文革”结束十周年，某出版社约我写两篇文章，其中之一，就是这篇讲“文革”期间的中学教师的。因为我从1964年当实习教师，1965年正式当中学教师，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都在中学工作，直到1978年考上研究生才离开。虽然这不是回忆录，但其中所举事例全部是我亲身见闻。因种种原因，此文一直没有发表，现《历史学家茶座》^①开张，就以此文会会茶友。

毕竟是20年前的旧文，校阅一遍后发现有些说法已不同于我今天的文笔。但我觉得还是不改为宜，以保存一段20年前的历史。当时去“文革”未远，亲历者尚多，文中所用“文革”语词都还熟悉。考虑到今天的读者会不知所云，或者产生误解，交稿前又加了一些注。对比我年长的人来说，无异画蛇添足，自然不必浪费时间。

平心而论，“文革”前的中学教师只能算是知识分子中的下层。一、二级教师即使在市重点中学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在普通中学和新办中学中，连三、四级教师也是寥若晨星，能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的人是极个别的。教师的工资最低不到40元，而以五六十元居多，八十以上已属高薪。有的学校虽有“统战对象”，大多也是民主党派的一般成员，三年困难时期还领不到“黄豆票”^②。令人羡慕的寒暑假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社教学习”“学大庆”“小四清”和下乡劳动等所占用。唯一的“政治待遇”

① 《历史学家茶座》，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开始出版的系列图书。——编辑注

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极其紧缺，并且都要凭票，对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负责人等统战对象发给可购买副食品或在指定地方就餐的票证。其中最低等级的是每月可凭票购买两斤黄豆。

是可以看《参考消息》^①和若干“内部书”(如溥仪《我的前半生》);当然,听文件时能享受干部待遇,但付出的代价是任何运动中也逃不了干部“待遇”。不过,中学教师们甘于淡泊,习以为常了,很少有人想另谋高就。加上对“资产阶级思想”“白专道路”“成名成家”越来越严厉的批判,以“专家”“教授”为奋斗目标的人即使还有,也只是凤毛麟角,而且也不便公开表白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声号令,中学教师一夜之间被抛到了“斗争对象”的最前列,成了知识分子中受冲击迫害最严重的一部分。这倒并不是哪一位领导或哪一条路线作出的决定,也从未见诸哪一号红头文件,而是他们的学生——这批被狂热的个人崇拜和“造反精神”煽动起来的、似懂非懂的“革命小将”^②,决定了他们的厄运已在劫难逃。

1966年6月初,紧接着北大聂元梓等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发表,各中学党支部得到上级紧急部署,立即发动全体师生响应中央号召,用大字报揭露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中学领导和教师还被要求“触及灵魂”。各校连夜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作准备,目标自然指向一些平时落后以及用当时的观点看来“问题严重”的教师。但是由于报纸已经公开树立了斗“黑帮”^③的样板,又接二连三地发表煽动性的评论、报道,这些部署很快被中学生打乱了。

中学生年龄在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之间,年龄最大的也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思想,年龄小的更没有摆脱嬉闹的童趣。但在多年延续的“左”的思想的教育下,对“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已经有了很深的印象,耳濡目染,已习惯于把一般的错误缺点当作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言论,把有这些错误缺点的人当作“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国家改变颜色”的阶级敌人。对领袖的崇拜又使他们绝对听从报纸上的一切号召,追随首都发生的一切“革命行动”。好奇心驱使他们不顾具体条件地模仿他们认为革命的举动,狂热性使他们不闹个天翻地覆决不罢休,青少年免不了

① 当时规定17级以上干部方可订阅《参考消息》,中学教师可以集体订阅,集中保管在学校。曾经有人因在公共场所看《参考消息》或带回家中而被定为“泄漏党和国家机密”,受到处分。“文革”期间的大字报中也不乏揭发此类罪行。

② “革命小将”开始时是指红卫兵,稍后即泛指全体学生。或简称“小将”。学生也以此自称。但对小学生一般称“红小兵”。

③ “黑帮”泛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首先在北京使用,迅速扩大到全国。

的幼稚顽皮又往往使他们以恶作剧和破坏为乐事，于是高年级的学生急于像聂元梓那样揪出一个本校的“三家村”^①，把党支部书记或校长搞成黑帮。有的则要学姚文元、戚本禹，批倒批臭某一本名著、某一位大人物。低年级学生则大多热衷于用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至于“牛鬼蛇神”的标准，当然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与教师关系的好恶。在大同学的影响下，他们也越来越注意“上纲上线”。

大字报以几何数级的速度增加，铺天盖地而来。虽然“揭发”的内容大多是鸡毛蒜皮的普通现象，但帽子都大得吓人，凡是点到名的都是“牛鬼蛇神”，而学校中除了工勤人员以及不大接触学生的部分职员外，很少有人幸免。

首当其冲的是学校领导、政治教师和班主任。由于长期的“突出政治”教育，学生对领导报告和政治课都作详细记录，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在这些记录中自然可以找到很多与现行理论和政策不一致的内容，或者对成了黑帮的前领导人的赞扬语句等，这些都成了“揭发批判”的重磅炸弹。班主任大多事无巨细都要管，对学生也会有很多具体要求，如今都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罪行”。这些大字报的内容今天看来令人啼笑皆非，例如：“你在政治课上说人人都会犯错误，伟大人物也难免。难道毛主席也会犯错误吗？这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在会上讲彭真和苏修作斗争，是为黑帮涂脂抹粉，是黑帮的走狗。”“你老是要我们好好读书，为什么不要我们学《毛选》？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吗？”“××是工人子弟，你却让他留级，这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迫害。”“你鼓励××考大学，还替他个别辅导，这是引导他走白专道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其他教师也少不了这样的大字报：“你在第一课就大讲化学的重要，难道毛泽东思想不重要吗？”“你为什么在课上教 Miss、Mrs 这些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小姐、太太吗？你是想复辟资本主义！”“电影《怒潮》是一株大毒草，你为什么要教里面的插曲？这是毒害青少年的滔天罪行！”“图书馆里的《燕山夜话》为什么还不烧掉？你还想留着放毒吗？”至于教师工作中的疏忽或缺点，更给学生提供了发泄的机会：“你对我们工人子女为什么这样凶？这是什么立场？你还要同学滚出去，你要工人子女滚出去，想让资产阶级子女进来吗？”“你上次听报告时坐在下面打瞌睡，说明你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平时衣着端正的教师被称为“资产阶级老爷”

^① “三家村”原指北京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因合写的《三家村札记》被定为“反革命大毒草”而得名。后泛指一切由三人或多人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少奶奶”，头发抹油的被指为“阿飞”“小开”^①，穿过西装的就是“洋奴”，家庭出身或历史问题已经公开的则分门别类冠以“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特务”“老右派”“吸血鬼”。青少年丰富的想象力不幸被运用于政治斗争：一位身体肥胖的老教师被勒令交代在旧社会的剥削罪行，因为学生认为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他却能长得那么胖，不是地主也是资本家。一位与某本小说中一名特务同名的教师被勒令交代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潜伏”下来的，学生还断定他家中有无无线电收发报机，否则又怎么与台湾联络呢？

这些闹剧本来是不难制止的，但“文化大革命”就是需要闹事。教师们被要求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对大字报不仅不允许有申辩或反驳，还要欢迎，要引火烧身，触及灵魂。无知的学生却认为教师们必定是“做贼心虚”，完全根据大字报的多少及上纲上线的严重程度确定谁是牛鬼蛇神。邪恶的闸门一经打开，就再也无法关闭，不需任何手续，也不必确定什么标准，只要红卫兵或“小将”发出勒令，那么即便发令者只有一两个人，被称为“牛鬼”的教师也得乖乖服从，被监督劳动、挂黑牌、戴高帽子、身上写字都得接受，鞭打、跪煤渣、爬行、剃阴阳头、喝泔脚水也得照办；稍有不顺从，就会招来更大的迫害。由于红卫兵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和行动计划，所以你斗你的对象，我打我的“牛鬼”，你打过了我还要斗。地处通衢的学校还有大批北京及外地红卫兵光顾，他们也可以在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当场揪出几个“牛鬼”来实行武斗。抄家风刮来后，红卫兵根据自己的标准选择对象，以至有的学校被抄教师十有八九。这种抄家既没有户籍警及里弄干部的配合，又不列清单，不给收条，大多是毁灭性的，抄走的物品也不知去向。

学校领导既要应付红卫兵对自己的揪斗，又要贯彻上级意图，领导学校的运动，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大多已无法控制局面。有的党支部书记正在开会研究组织批斗某人，却被红卫兵闯进来揪去，与某人一起戴上了高帽子。有的党支部确定的“左派”，却被学生定为“牛鬼”。某校一位20岁的团委书记是党支部核心组成员，但被红卫兵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斗。他白天只得与“牛鬼”们一起接受监督劳动，晚上再参加核心组研究如何批斗“牛鬼”，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工作

^① “小开”是上海方言中对于老板的儿子或富裕而有地位的年轻人的称谓。原来并无贬义，如潘汉年曾有“小开”的外号。

组的进驻和《十六条》^①的公布并没有改变教师的命运，教研组长、备课组长、高年资教师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而班主任、工会小组长都被解释为“当权派”，这样一来，“小将”们的斗争大方向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了。

相比之下，其他阶层和部门的知识分子在这一阶段多少要幸运一些。生产、科研部门还在维持正常工作，运动还没有全面铺开；党政部门受冲击的主要是领导干部，还没有轮到一般知识分子；文艺单位的重点对象是“黑线人物”“三名三高”的人物；小学“关门”搞运动，学生不参加，暑假后就停了课；大学生的目标开始是有地位、有影响的“反动学术权威”“黑帮”“三反分子”，不愿在普通教师身上花费精力，而且毕竟比中学生少一点无聊、好奇、恶作剧式的破坏行为。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提出一个臭名昭著的理论，即每个人“既要当革命的动力，又要当革命的对象”。这当然只是用来欺骗民众的，因为他们一伙从来是不会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的。对于全国民众来说，虽然曾有相当大一部分人为领袖的威望所感召，被“战友”^②“旗手”^③的口号所蛊惑，自觉地实践过这套理论，但一旦看穿了其中的奥妙，就不会再上这个当，迫于压力，至多也只是阳奉阴违。但中学教师却没有这个自由，职业使他们不得不在普遍当了“革命的对象”以后又要扮演“革命的动力”的角色，或者在受到这场“革命”残酷打击的同时却要违心地为这场“革命”叫好。

从1967年开始，根据“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各中学陆续复课。到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驻，各校基本上都恢复每天上课了。当时教师上讲台困难可想而知：在外游荡了一两年的学生已经不是昔日可爱的红领巾了，他们的学业荒废，纪律松散，但“造反”的技巧却相当熟练，而且这批“小将”对教师当“牛鬼”的情景记忆犹新，都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无论是出于“革命”觉悟，还是纯粹的恶作剧。此时学校的真正领导工宣队中虽也不乏正派的工人，他们会自发地维护学校秩序，制止学生的胡闹，但更多的却是对教师惩罚式的“改造”和不负责的瞎指挥。有的教师惊奇地发现，来领导和改造自己的竟是以前教过的差生，或者是附近声名狼藉的人物。有位工宣队队员发现政治教师准备了自己的讲课提纲，竟大发雷霆：“上政治课为什么不

① 《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② 所谓“战友”，是指林彪。

③ 所谓“旗手”，是指江青，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学《毛选》？你写的东西难道比毛主席的话都重要吗？给你进教室就想放毒吗？”有的教师实在无法对付捣蛋的学生，请“师傅”去课堂“宣传毛泽东思想”，领导则大为不满：“知识分子就是只有嘴上一套，看看你又长又大，小鬼不听话不会请他吃生活^①？”由于在“牛棚”中“靠边”“进学习班”^②的教师还不少，能进教室的教师不胜负担。但一位工宣队指导员在检查课程表后突然有了重大发现：“怪不得教师不够，原来你们一星期只上16节课。我们在厂里每天要站8小时，你们站多久？下星期开始每天起码上6节课，总共也不到5小时嘛！”

更难的是进教室讲什么。政治课学毛选，语文课教毛主席诗词，英语课念英文革命口号，美术课画忠字，音乐课唱语录歌，数理化课也少不了先念几段毛主席语录，再讲几句“为革命学好××”的道理。但再大的帽子也镇不住这批“小将”，何况这样的课连最规矩的学生也不爱上。即使这样的课程表，还是经常要改变。如果哪一天晚上8时有最新指示或“两报一刊”的重要文章发表，教师除了要带领学生热烈欢呼、坚决拥护、游行到半夜外，第二天早上就得准备停课学习。林彪所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确已施之于教师了。因为不管这些指示或号召多么出乎意料，多么让人无法理解，多么不得人心，他们都得向学生宣讲它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说明它多么及时，多么英明，多么符合“革命群众”的心愿。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次次的欢呼和宣讲使教师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折磨。作为“园丁”“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本来应该用真善美来教育学生。但作为被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他们却不得不用连自己都不想念的假话、错话来欺骗自己的教育对象。他们宁肯学生们都不相信这些话，但可悲的是，毕竟还天真的学生中总是有人信这些出于老师口中的“真理”。

如果说，宣讲一类动口不动手的事还能用读报、照本宣科、让学生“自学”等办法来应付搪塞，具体的运动就要“忠不忠，看行动”了。其中最使教师左右为难、心力交瘁的就是动员学生上山下乡。

本来，在“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发布之前，学校已经在进行上届高初中毕业生的分配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被安排去了农村。由于有一部分能留在工厂，另一部分学生对农村边疆充满美好的幻想而主动报名，还有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迫于

① “吃生活”系上海方言，意为揍一顿，或体罚。

② “文革”期间各种各类学习班不计其数，形式和内容各异，既指真正的学习讨论，也包括带强制性的隔离审查、关押或刑讯逼供。

形势，“自愿”服从分配，或主动要求去农村，因而矛盾还不太尖锐。到1968年12月22日晚上“最新指示”一发表，原来的分配计划立即为“一片红”所取代——无论本人或家庭有什么困难，统统得去农村。最倒霉的是那些已经送了子女下乡的家庭，本来指望下面的弟妹可以留在城市，现在也得“一片红”了。由于一些学生的确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也有的家庭寄希望于拖延战术，到1969年夏天还没有完全落实最高指示。这时教师又有了光荣任务——在工宣队的监督下把留下的学生全部动员下乡。

由于动员对象都是老大难，方法自然有了创新：

一是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位卖菜大嫂介绍女知青到乡下结婚，被公检法以破坏上山下乡罪逮捕，游街批斗。因为“破坏上山下乡”而被判死刑的案例也时有所闻。某“走资派”和他女儿分别在隔离室和家中得到明确通知：如果现在报名，老子立即解放，女儿可以与其他革命群众一起到“反修前线”（黑龙江省）插队。三天后，在女儿临上火车前，这位干部获得解放，由隔离室直接赶往车站送行。一名“逃亡地主”因阻挠儿子下乡在单位受到批斗。尽管他申辩完全是儿子自己不愿，却被痛斥为这正是他长期毒害的结果，自然难逃罪责。刚回家，学校的红卫兵已等在门口“追穷寇”了。待夜深人静，这个被斗垮了的“阶级敌人”跪在儿子面前苦苦哀求，请顾全他一条老命马上报名吧！

二是大造声势，大办“学习班”。家长中的“革命群众”被通知停止工作，在家参加由单位、里弄、学校派人一起办的“学习班”，什么时候报名什么时候结束。另外组织若干队红卫兵轮流到各家门口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待红卫兵一到，家长就被唤至门口一起读语录，呼口号，从“吃闲饭可耻，上山下乡光荣”一直叫到“毛主席万万岁”。回屋学习不久，另一队的锣鼓口号声又传来了。其实学习班上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讲了，但“落实最新指示不过夜”，到半夜还不能收场。这办法果然收效，大多数家长“自愿”支持子女报名。

三是雷厉风行，速战速决。学习班随时备有批准通知，只要稍一松口，立即送上通知。几分钟后，大红喜报已在锣鼓口号声中贴在门上。“吃闲饭可耻”自然已换成“向革命家长学习、致敬”。待家长清醒过来想要变卦，户口迁移证和补助的布票、棉花票、购物券已送到面前。

这还不是什么“先进典型”，执行任务的教师就已经难以完成了。人类的良知往

往驱使他们抵制这种不人道的做法,但包干的名额完成不了又无法向工宣队交代,更何况伟大领袖的指示岂能不照办?

到了1970年,每年有一部分毕业生可以进工矿或照顾留城了。这固然解决了不少困难,但粥少僧多,加上边疆农村对学生来说再也不是充满浪漫色彩的牧歌田园,分配成了教师更大的难点。当时工宣队掌有分配的实权,但他们有“工人阶级”这块金牌,必要时还可以用“不了解具体情况”为托词,再说家长和学生一般不敢把矛头指向工宣队,所以不会受到什么威胁,教师却无法逃脱无休止的吵闹、谩骂、纠缠,甚至殴打。正因为如此,每次毕业分配关键阶段的会议成了中国出席率最高的通宵会议。这种会议一般都在校内僻静处或校外开,目的是要最后从众多“可上可下”的对象中确定“照顾”名单。班主任们深知其重要:多挤进一个,今后就少一个麻烦;何况这些学生的情况本来就大同小异,可上可下。于是正在患病的教师在家属护送下服药上阵,年轻的妈妈在会议室隔壁搭起婴儿床,讷于言词的教师事先写了详细材料,几乎人人手里都备有大叠学生或家长的病历卡与各类证明。这样的会议一般不止一次,结果必定喜忧参半。但喜者至多喘了一口气,因为摆平了这一个,原来自知无望的人又产生了争一下的希望,或者觉得自己吃了大亏。于是有采用“盯人”战术的,教师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你有饭吃我也要吃;有哀求的,七八十岁的老太跪在面前,不答应照顾就不起来;有“揭老底”的,“你这个老牛鬼不要翘尾巴,胆敢打击我们工人子女就再斗你”;有全武行的,“打了你这个臭知识分子又怎么样”?这些误解教师的家长中虽然也有粗俗野蛮的无赖,但大多也是无权无势的“革命群众”。真正有来头的人根本用不到跟这批“改造对象”打交道,只要打通工宣队、区“工办”(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公室)或“乡办”(上山下乡办公室)的关节,子女的档案就会从学校中神秘地提走,进入军队、外语培训班、保密单位或指定的部门。

上山下乡不是学校唯一的运动,只要一声令下,一个新的高潮就必然掀起。与其他行业或单位不同的是,教师们自己振臂高呼、身体力行还不行,必须带领“小将”落实最新指示,同时却又得接受无休止的改造和“再教育”。一声“加强战备”,教师马上奉命带学生下乡“战备劳动”一年。落实“学工学农”,中四年级就改为半年工厂、半年农村,不再上课。一张“开展步行拉练”的通知,每年又增加了两星期的“练

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但同时，一个“马振扶中学事件”^①，就会出现“迫害学生”的大小典型，学生也马上懂得对老师可以用“自杀”相威胁。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恢复不久的考试和升留级制度就全部作废。这种“既当革命对象，又当革命动力”的经历，对运动初期饱受打击的教师无疑是雪上加霜，是更残忍的慢性迫害。

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大的倒退，每次都出现物质的毁灭和精神的崩溃。在此期间，文明屈从于野蛮，道德沦丧于堕落，愚昧战胜了智慧，狂暴取代了理性。目睹这样的倒退而无能为力是痛苦的，被迫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参与倒退，则是更大的痛苦。

教师被比喻为蜡烛，这更适合于中小学教师。因为在他们中，即使是毕业于著名高等学府的高才生，要想再发表多少论著，或取得某项创造发明，也是不大可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学生，从学生的成就中看到自己的成果，得到最大的安慰。要说“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学教师人人安于清苦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或许言过其实，但他们无不以“桃李满天下”的理想来获得精神支柱和心理平衡，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这根支柱在“文革”前的大小运动中已经有过多次动摇，但始终维持着，“文革”一来就完全折断了。学生升入上一级学校的比例，考入大学及重点大学的数量，获得各种奖励和名次的记录，都成了教师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状，成绩越大，自然罪行越严重。最出乎意料的是，原来最钟爱的学生送来了“揭发控诉”的大字报，已经毕业的高才生“杀”回母校，在已经被打翻在地的老师身上再踏上一只脚。时至今日，老师们早已原谅了这些迷途的羔羊——他们当时有的作为“修正主义苗子”受到巨大压力，有的急于划清界限，有的误信了大字报揭露的“滔天罪行”，也有的在红卫兵的支持下丧失了理性；但在当时教师所受到的打击是致命的，他们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

以后整整十年，这根支柱再也无法恢复。教师们只能把自己的学生一批批送往边疆、农场、工厂、商店、部队，却再也无法送入大学。即使在“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以后，教师们受到的打击也多于安慰。虽然也听到几位原来品学兼优的学生终于得到入学机会，但更多的却是近于文盲的学生被推荐进了名牌大学，在校时打砸抢出

^① 河南马振扶中学一位女学生因外语成绩不好受到教师批评，据说因此而自杀。此事被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学生的迫害，在全国进行批判教育，该校校长和有关教师被判刑，“文革”结束后才获平反。

名的学生当了某大学“上管改”^①的标兵。更使他们难以理解的是,尽管他们对来调查的人员详细地反映了某些学生在校时并非“支流”的错误,这些人依然很快入党,“结合”进领导班子,成了“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而他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却很少能得到这样的机会,甚至成了批判、清查的对象。有的教师“劣性难改”,稍有可能就在“为革命而学”“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世界革命”的口号下为学生辅导数学、机电、书法、外语,并且发现了有希望的苗子,但到毕业分配时却眼睁睁看着他们踏上去边疆、农村的列车。在如此巨大的反作用下,本来就只凭惯性保持的行为必然会越来越接近于停止。

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学里对教师为人师表这一点是非常强调的,绝大多数教师在衣冠服饰、言辞谈吐、待人接物等各方面都很注意作出表率作用,以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自然也不限于学习,品德始终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包括一系列个人道德方面的行为规范。同社会上相比,学校一般都是更文明、更纯真的地方。从1958年的“教育革命”开始,中学的文明道德教育受到一次次的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进驻中学的工宣队真的“最有纪律,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彻底性”,如果学生下乡见到的贫下中农真的具有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能力,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教师一定会衷心拥护、虚心服从的。可惜事实远非如此,大家不久就发现,“师傅”们的不少行为是他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不能想象的。管“清理阶级队伍”的以打人逼供为手段,专案组组长是不识几个字的长舌妇,负责毕业分配的可以用工矿名额换来女学生的贞操和自己子女的好单位,办公室里可以动手动脚“开玩笑”,抄家物资也会“处理”到自己家里去。教师们只能把这些当成“支流”“小节”或个别现象。但是这些领导阶级的成员并不需要改造,在学生面前也不会收敛,学工学农又使他们和学生有了大量直接的接触,学生们从教师那里学到的理论就遇到了事实的挑战。

喊着“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口号进厂的学生惊奇地看到,工人中干活偷懒、骗病假、说谎话的花样竟如此之多,揩公家油、顺手牵羊竟那么容易,言谈打闹竟这般粗俗无聊,而对“文化大革命”等新生事物的议论竟那样反动。到“广阔天地”中去的学生也知道了原来贫下中农并非事事先想到集体,要想获得好评就得多帮他们干自留

① “上管改”是指“文化大革命”时期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地的活或者送些礼物，会作报告的干部吃喝水平同样高，“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忆的苦竟发生在“三面红旗”期间。对这一切，教师既无法保持沉默，又不能如实发表自己的看法，只能强调所谓的“本质”和“主流”。

经受了运动初期的打击，已经斯文扫地的教师早已不敢为人师表了。事实上，在工人、贫下中农两位老师面前，在学工学农、拉练、开门办学、走出去请进来这样的环境里，其他的师表早已无济于事，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教师的职责就是教育学生无条件地以工人、农民为榜样，而不能对他们的行为稍有异议。不仅如此，还要把社会的倒退和混乱描绘为“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把“文盲加流氓”的泛滥称为“一代更比一代强”。总之，教师非但注定要当文明的殉葬品，还要为文明掘好墓穴。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令人痛心的事实，“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在中学教师这个阶层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那么，在这十年间走出校门的中学毕业生又会具有怎样一种人格呢？

原载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当年“样板”

“文革”中的中国，曾经是一个“样板”世界。八亿人民听的、看的、唱的是“样板戏”，除了领袖标准像以外唯一的“样板画”一度只有那幅《去安源》，工业的样板是大庆，农业的样板是大寨，全国的样板是解放军，斗批改的样板是“六厂两校”（指二七机车车辆厂等六家工厂和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有全国性的样板，也有省市一级、县一级以至下到最小的基层的样板。有久红不衰、事事领先的，也有随生随灭、昙花一现的。有正面的，还有“反面教材”。不仅有国内的，还可以有外国的。当然，最高的样板还是那几位“始作俑”的领导人，所以江青被树为“旗手”，林彪被捧为“亲密战友”。对这场今天看来颇如天方夜谭的样板运动，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当时谁也免不了参加学习各种样板的运动，说不定还参加过树立样板的工作，或者曾经被树为样板呢！

一

所谓样板，原来是指一种用于检验工件轮廓的工具，或者是一种划线或对准刀具的工作。用它来代替典型、榜样，除了取其意义相近外，大概还取其不能差一分一毫的绝对标准的特点吧！这一点虽然找不到什么理论根据，也无法向发明者证实，但有不少事实可以证明。当初“普及样板戏”时，不是就有人因为擅自做了一些什么变动而成为“破坏革命样板戏”的反革命了吗？

翻遍中国的古书也没有找到“样板”这个词，但“样”却早已有了这种意思。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齐人呼寒食为冷节，以面为蒸饼样，团枣附之，名曰枣糕。”

然而,这种树样板的运动实际上古已有之,只是名目和方式不一定相同而已。两千多年前,当孔子面对卫国的众多人口时,他提出的方案是“富之”和“教之”,即先让老百姓有吃有穿,生活改善,然后对他们实行教化。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取得独尊地位,孔子的教化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纳,儒家学说自然也成为实施教化的内容。但是,被教化的对象是基本不识字、不读书的愚民百姓,而儒家学说的深奥语句即使对一般读书人来说也是不得其门而入,因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儒家学说中归纳出若干简单的道德标准,在各地物色对此身体力行的人并加以宣扬,以便百姓效仿。秦汉以降,在各个乡设置的基层官吏中就有一位“三老”。据《后汉书·百官志》:“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妇,让财救患,及学士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当时全国有一千多个县级单位,三老不下万人,通过他们的教化,各地树立了数以万计的样板。

从理论上说,这些样板都能从某一方面体现儒家的道德标准,足以成为公众的榜样,他们又遍布各地,使百姓能亲见其人,亲闻其事,在基本上不存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条件下,他们便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实际上,在生产力低下的专制统治下,没有多少百姓能过上“衣食足”“仓廩实”的生活,更没有多少人能领会儒家的“礼义”“荣辱”,客观上并没有那么多的孝子顺孙、贞女义妇,所以要树样板就只能降格以求,或者移花接木,甚至弄虚作假。与此同时,三老中虽不乏正人君子,但土豪劣绅、流氓无赖自不在少数,由这批人树起的样板会是什么东西是可想而知的。对那些因循奉职、但求无过的三老来说,既然是朝廷功令,又是天下通例,那当然也就顾不得什么质量,完成“政治任务”要紧。结果是,被树为孝子的人却同父亲分居,以庐墓三年受到表彰的人却在此期间添了两个儿子,改嫁了的女人被树为贞女,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财主家挂上了旌匾,其中也少不了三老的亲朋好友、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强人。

对这些现象,平民百姓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既没有文化,更没有得到法律保证的控告检举权利,所以至多只能在下面议论讥笑。汉末流传的一首民谣唱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似鸡。”这类民谣显然也是出于有正义感的文人之手,然后才在民间流传的。或者在民间产生,又经过文人加工。由于社会的闭塞,一般民众不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往往把这类假样板看作本地的个别现象,对外面的样板还会深信不疑。

对三老们的各级上司来说,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稽查户口和征收赋税,因为这类样板越多,就越能显示自己教化深入的政绩,也是获得升迁的重要资本。所以除了个别太拙劣的作假或遇到少数刚正不阿的官员以外,这类样板一般是不会受到怀疑或复查的。要不是名额有限,地方官谁都会多树几个。

各朝各代的具体制度并不相同,但像“三老”一类的角色从来不会缺少,各种“善行”的样板也林林总总,绵延不绝。统治者不仅需要欺骗民众,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因为一方面,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秩序,越来越需要利用儒家学说中有利于他们的部分,将这些教条越来越具体化,用于束缚民众的手脚,禁锢民众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从来不想身体力行,甚至连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不愿遵守。更何况有些教条是完全脱离实际、违背人性的,连有一定修养的人都难以做到,养尊处优惯了或耽于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老爷太太如何受得了?例如,十五六岁的少女就被要求为从未见过面的未婚夫守一辈子寡;在长达三年的居丧期间不仅不能吃肉喝酒,也不许有性生活。这样的节妇、孝子有几个人能做到?像“二十四孝”所宣扬的卧冰、割股、杀子的孝行更非正常人所能想象。又比如,在明朝时官俸低得出奇,如果不捞一点外快,就会像海瑞那样生无积蓄,后无余财,又有几个官员能做到清廉?这种现实的矛盾就使统治者乞灵于各种样板,树别人,也树自己,用于骗人,也用于骗己。

好在中国的文字非常发达,可用于描述样板的词汇极其丰富,又有的是妙笔生花的文人学者,不但能引经据典,而且可以无中生有,“春秋笔法”的光荣传统更使大大小小的尊者、贤者和亲者能合法地享受到“扬善隐恶”的特权。所以在正史、地方志中留下了无数忠臣、循吏、良吏、义士、孝子、节妇、烈女的样板形象,而更大量的家传、族谱、墓志铭、神道碑、谥文、诰命、祭文、诔文等几乎把所有能写就的对象都粉饰成了各方面的样板。由于谁都不知道这些样板是怎么回事,所以被树者心安理得、受之无愧,而旁观者亦习以为常,绝不会过于认真,显然这类样板越普及,它们的作用就越有限。但是它们已经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这个社会还存在,就会同样存在下去。

在一个政治目标与大多数人的愿望不符、道德标准与生活实际脱离的社会中,出现这种名不副实的样板是不可避免的。民众知识标准的低下,自由舆论和公正传播媒介的缺乏,政治上的专制和腐败,是这些样板生存和繁殖的温床。

不幸的是，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残余的肃清，这类温床依然存在，有的还相当稳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在“革命”的标签下，一些封建的、宗教式的、法西斯的模式竟一度成了中国社会的合法机制，样板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达到高潮，就绝不是偶然的。

二

如果说封建时代的样板是以道德典型为主要标准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中样板的唯一标准就是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样板从来就不是什么群众运动的产物，而是按照某些人、某项运动的特殊需要精心制造出来的，目的是用以证明这些人、这一运动的正确，进而煽动、诱骗更多的人拥护这些人，投入这一运动。所谓发现典型，实际上是根据现实的目标去寻找合适的对象；所谓总结典型，实际上是随意贴上各种标签，加上各种“合理”的情节，纯化拔高。这样，一个样板就产生了，只要开动宣传机器就行。

江青曾经吹嘘，“文化大革命”是由她搞的样板戏开场的，这倒道出了样板的真谛所在。实际上，“文革”中的每一场重头戏都是由样板开锣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聂元梓等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上海滩上的“工人造反派领袖”王洪文等都是这类样板。而在“夺党内走资派的权”、大联合、三结合、上山下乡、城市“闲散人员”下乡、精兵简政、干部下放、工农兵上大学、工军宣队管学校、反潮流、批林批孔、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中，大大小小的样板也应运而生。

为了树样板而采用的方法层出不穷，但也不外乎几个方面：

一是通风报信，以便样板“自然”产生。如赫赫有名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际上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康生的授意下，由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出马促成的。不少带头打倒某人的“左派”，都是预先得到某种暗示甚至明确指示才行动的。当然也有因为没有弄清上面的意图或者上面的临时改变、不再认账而倒了霉的，有时还由于手法拙劣闹出不大不小的笑话。一次某地为使一位“老样板”立于不败之地，遂将“老样板”列入“揭发”人员的名单。谁知忙中出错，忘了通知他本人，代他签了名的大字报就已经出笼。“老样板”不知内情，赶紧辟谣，并声明要与这种矛头指

向中央“文革”的“阶级敌人”斗争到底。另外,事先赶不上的,也要争事后第一个响应。例如,在晚上八点钟“最新指示”发表之前,获得内情的领导已经指示笔杆子为样板单位、样板个人起草坚决拥护的表态,甚至不用本人过目就已经送进报社印刷厂了。

二是乱贴标签,无限拔高。一个农业样板粮食增产,可以归功于打倒了走资派,也可以说是清理阶级队伍的成绩,还可以称为“三忠于,四无限”的必然结果,或者是斗私批修斗出来的。李庆霖因为子女下乡,家庭困难无法解决,无奈之下给毛主席写信,经过反复宣传,竟成了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反潮流”英雄。上海一位平时表现很差的女学生,据说是因为游泳时救同学而溺死,唯一的根据是未溺死的女同学说“好像有人在水里推过我一下”。由于当时正缺少批判“一代不如一代”的典型事例,所以立即被树为样板,被称为“闪耀着共产主义光辉”的英雄。

三是移花接木,锦上添花。为了使样板能“高、大、全”,就只能把各种好事都集中在样板身上,把不同时间的好事集中在一起。某一小组、某一单位的成果被集中在一位样板身上,甚至与他毫不相干的外单位的成果也会被说成得到了他的帮助。样板单位照例可以额外得到各种物资和资金,享受各种优惠或减免。由于只算“政治账”,经济账就可以一笔勾销。单项冠军硬要捧成全能冠军,如那些全国闻名的样板是无事不先进、无日不见报的,不但在评法反儒、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政治运动中领先,连文艺、体育也成绩突出。一个样板少年武术队还进京表演,当然从教练到队员都不必是汇报单位所在地的本地人,钱也可由国家掏,只要借一块宝地挂个名就行了。已经不在世上的样板更方便了,整理材料的人从一位英雄的本子上找到两句豪言壮语,立即发表,并接连作了长篇阐述,以证明只有经过“文革”洗礼的革命小将才有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但很快有人发现,这两句话抄自一本“文革”前出版的书上。不过,立场鲜明的领导立刻作了裁决:“他已经用行动实践了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就是他的。”有一次经过再三启发,群众提供了一件助人为乐又不留名的好事,但仔细一算,当时那位样板还在幼儿园;好在笔杆子还是有心人,在见报时把时间推迟了八年。又如,为了适应“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需要,在雷锋逝世十几年后,又发现了当年他曾与演坏戏的人作斗争的事迹。

四是篡改历史,胡编乱造。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对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样板,不仅要历史清白,而且应一贯先进(少数树为

“转化”的样板除外)。可是有的对象偏偏不符合要求,甚至劣迹昭彰,但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却非树不可,有的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钦定的名单,于是成分可以现改,历史问题结论可以重写,处分材料可以抽掉甚至销毁。“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名党羽的所在单位曾奉命调查他的材料,但当该人被树为“路线斗争觉悟高”的样板并出任要职时,有关他父亲和本人劣迹的记录早已被抽掉。更有甚者,有时为了证实样板的阶级斗争觉悟,竟连当时的“政策界限”也不顾,硬将被他斗争或“揭露”的对象定为敌我矛盾。至于“活学活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样板的事迹,本来就是故弄玄虚的,自然就更能按需编造了,所谓“讲用”“经验”,只要由笔杆子根据上面的精神写出来就是。曾经名噪一时、吸引了成百万人观摩学习的江苏农妇顾阿桃,就坦承她所讲的一切都是“他们写好了教我讲的”。

经过这样一番装点,十恶不赦的罪犯也可以成为圣人。即使原来做了好事或表现比较好的人,当他终于以样板的面目出现时,也已经面目全非了。

三

应该承认,当时参与制造样板的人,除了始作俑者和极少数心腹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无辜的执行者,有的人甚至是出于崇高的信念。但无可否认的事实又是,他们所做事情即使不谈政治上的问题,在道德上也不是很光彩的,或者是违背人类良知的。而全国七八亿人中,除了极个别头脑异常清醒者(姑且肯定有,但我是很怀疑的)和少数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自由的人以外,都被或多或少地愚弄了。也就是说,那些样板都曾经不同程度地起了作用。

怎样来解释这似乎难以置信的事实呢?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国社会的传统影响外,还应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的特殊因素。

首先,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掀起的个人崇拜的狂热,对领袖的崇拜很自然地延伸到他的“亲密战友”、他的妻子以及一切被纳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延伸到他们所树的样板。与此同时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通过“文革”中一系列的“红色恐怖”运动,已经成了一张谁也无法逃遁的巨网。令人目眩的政治风云已经使人失去了自主力和自制力,沦为不敢有自我情感、自我意识的政治工具。

这里不妨列举一些当年参与树样板的人员所熟知的说法和做法:

“要怀着对毛主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强烈的阶级感情去发现典型，总结典型。”这就是说，你先得肯定有先进典型，甚至肯定某人就是典型，否则就是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抹黑。于是再用同样的方法让群众回忆、总结，讲不出就等于对革命路线缺乏感情，结果当然是好事越总结越多，思想境界越提越高。

“不能就事论事，要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这就为任意夸大、无限拔高提供了理论根据。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好事就可以当作“捍卫革命路线”的壮举，连捡到失物归还、在大批判会上发言等差不多每人都可能做的事情，也可以套上“共产主义精神”“鲜明的阶级立场”“对毛主席的无限忠心”之类的桂冠。样板的高度已经不是取决于本身的事实，而是决定于领导要定多高或者出于“斗争的需要”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调查、总结的人员总是宁多勿少，宁高勿低，以免犯立场、方向、路线错误。

“总结的过程就是提高的过程。”具体说就是，有的事情在做的时候是不自觉的，总结时就应该提高到自觉的高度。有的事情当时没有想到它的意义，现在应该联系形势来看。有的事情是分散做的，现在应该集中起来总结。此外，还强调对总结的对象要从他思想深处挖掘，找出闪光的东西。结果是，一切先进事迹都是“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人民没有解放”“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怀着对中国赫鲁晓夫的满腔仇恨”“以实际行动批判活命哲学”的自觉行动。“闪光思想”的多少自然得看挖掘者的本领了，因为被挖掘者是无权否认的。

其次还应该看到，尽管很多极端做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却是在一些片面的、教条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这些方法在一些人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一些人操纵起来已经轻车熟路。

例如，片面夸大榜样的作用，任何运动都强调“榜样开路”“抓典型”。很多运动是错误的、不得人心的，当然不会涌现出什么先进典型，但为了运动的开展又非有不可，那就只好作假。领导和上级对此都会理直气壮，运动不是在“榜样”的带动下开展起来的吗？当上山下乡已经很难动员时，不少中学只好在毕业生中物色有说服力的对象（如兄姐已经下乡、独苗、独留、父母患绝症等），授意他们带头申请下乡，让他们到处报告讲用，以他们的“先进事迹”推动别人。一旦大功告成，他们却一个个进了工厂，除了身体不好等借口外，还可以说“他可以不要照顾，但组织上应该按政策办”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呢？

每当一个重要的样板出笼,全国的一切宣传机器立即遵命开动,报纸杂志、小册子上的社论、评论、长篇报道、领导题词,甚至最高指示,再加上座谈会、讲用会、表决心、“见行动”的报道,又是样板的照片、日记、豪言壮语,大批判文章,“群众”的回忆和赞扬等,几乎可以占据全部版面。同时,广播、电视、电影、戏剧、曲艺(如果当时还能演的话)、故事、宣传队、报告团、宣讲团等各种形式和手段也被充分运用,目的是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其他样板,则视其级别分别在各自的范围内如法炮制。而对样板有丝毫不利的情况,即使是千真万确,至多只能在民间口头传播。这样原始的传播方式当然无法对抗官方超强大的宣传工具,而且也免不了走样,在凡事都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这恰好又成为阶级敌人攻击革命样板的证据。当时除了一张精心选编的《参考消息》外,那时的中国人是得不到任何外部消息的,面对着“两报一刊”^①的白纸黑字(或红字),自然只有坚信的义务。样板周围的人们和熟悉内情的人,也只能认为是个别现象或者是出于革命利益的需要,不能不保持沉默,但他们对其他样板还是不敢怀疑的。

四

被树为样板的对象中的确有人原来就是坏的,但毕竟是极少数,而且其中有的人是从成为样板后才变得更坏的。大多数样板开始都是比较好的,在某一方面起过积极作用,有的是真正的劳动模范或某一方面的先进分子,不少人今天依然得到社会的肯定和公众的尊重,但他们或多或少说过违心的话,做过不实事求是的自我介绍,接受过对自己无根据的美化和夸大,少数人完全成了政治工具。这一复杂的现象也是与树样板的特殊手段分不开的。

在一般情况下,通过政治压力和正面诱导,能使样板符合要求。这里不妨举个常见的例子:

一位一贯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人被确定为“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样板,要为他准备讲用材料。

“你为什么总是超额完成任务?”“这是应该的。我们工人为国家多做一点,大家生活就好一点。我手脚快,干活时抓紧点就行了。再说现在领导也不敢抓生产,指

^① “两报一刊”是指当时公开发表最权威政策文件的媒体。

标定得低,所以容易超额。”这当然离要求差得太远。

“你学习毛主席著作吗?”“当然学的。”(谁敢说不?)“什么时候学的?”“小组里天天读,还有讲用会。”“晚上学吗?”“有时也看看。”“上完中班回家看吗?”“不大看。”“总看过的吧!”“对,看过的。”“你读什么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还有《毛主席语录》。”“××篇学过吗?”“记不得了。”“上次你们小组里不是读过的吗?”“噢,大概读过了。”于是他自觉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班回家学到深夜,对××篇特别作了认真领会的事迹被写进了讲用稿。

“你参加批林批孔吗?”“参加的。”(谁敢说不参加?)“写过大批判文章吗?”“我不会写,在组长写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你在批判会上发过言吗?”“我不会在会上讲话。”“那可不行呀!不能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否则要犯大错误的。这是立场问题,你一定要发言,可以让厂里人帮你写,你照着讲就是了。”“好的。”(当然无法拒绝。)*“你知道林彪、孔老二的罪行吗?”“林彪要害毛主席。孔老二么,报上说是坏人。”“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要你们工人当奴隶,吃二遍苦,能答应吗?”“不答应。”于是,他投入批林批孔运动,激发起为革命而生产的积极性的事迹产生了。作为弥补,一篇现成的发言稿送到他手中,并让他脱产接受政工干部的辅导,赶在事迹见报前在全厂大会上批判林孔罪行。当然也少不了补拍一些镜头。

样板情况不一,方法也不尽相同。对政治敏锐性强、文化程度高的可以用更含蓄的启发,对目不识丁者只要派人辅导他背熟代拟的讲稿,对本来就会迎合钻营的倒要别让他吹得太离谱,基本离不开政治压力和正面诱导这两手。

至于个人的“讲用”“介绍”,即使本人思路敏捷、文笔流畅,他的稿子也得经过领导的层层审查和修改。当作者拿到打印或铅印好的定稿,往往已经面目全非,不仅加上了很多他根本没有的思想,或增添了不少他从未做过的事迹,而这一切又必须由他自己向公众宣传。意见是徒劳的,修改更不可能。

“这一段话是不是提得太高了,我当时没有这样想过。”“你不能太谦虚嘛!当时没有想到,现在想到了不一样吗?这可是×主任亲自加的,是根据中央某某同志的精神。”“那件事是大家一起干的,也不是我带的头,现在说是我发动的,群众会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宣传你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革命的需要。集体也要有人代表的,这离不开党的领导。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可是我只干了三天,这里说夜以继日苦干了一个月。还有为国家节约了大概4万元,不是40万。”“这些同志太粗心了。

但稿子已经在常委会上通过了，明天就要见报，再改影响不好。好在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你就照讲吧！有问题我们负责做工作。”公开宣传后当然更不能更改，而且还会根据更高的领导、更新的精神不断提高和增加，本人永远只能违心地吹下去。一部分人慢慢习惯了这种程式，有些人已能主动配合，按需提供自己的思想和事迹，也有的人从此发现了自己的伟大，醉心于无休止的自我表演。

随之而来的荣誉和利益对一部分人的诱惑也是难以拒绝的。一些样板从此平步青云，委员、代表、标兵、模范、红旗，直至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机会出席各种文艺演出、招待会、宴会，参加疗养、外地参观、进京观礼、出国访问。有些样板虽然还是“普通劳动者”，但劳动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每次劳动都要成为记者采访和拍摄的机会。有些样板的工资虽然没有增加，额外的利益却会超过工资的总额。作为样板的单位不仅可以出干部，而且会获得优惠供应、贷款、资助、试验、减免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利益。这些当然会坚定一些样板继续努力当下去的决心。

不过，对大多数样板来说，伴随他们的并不仅是掌声、鲜花、美酒、闪光灯，也有烦恼、紧张和失落。

一是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因为政治需要而迅速树起的样板也会因政治需要而在瞬间垮台，由某一人物树起的样板会随着他被打倒而成为“黑样板”。要在本来就是经过层层加工才总结出来的先进事迹中找出“弄虚作假”“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欺骗群众”的事实是毫无困难的。当然，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些不倒翁式的样板，特别是在普通工农兵和对国计民生有影响的行业中，但是也少不了要对被打倒对象作一番违心的揭发批判，检查自己“受蒙蔽”的错误，以示彻底划清界限。

一是穷于应付各种活动，使样板们的本业无法继续，这对于有事业心的人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损失。而且各种运动、最新指示、公报、声明、社论的发表都要带头表态，都要热烈拥护、坚决支持，文化程度不高、没有表达能力的样板更是不胜其烦，往往要出洋相。笔者亲耳听到一位劳模出身的样板在批林批孔的讲台上厉声痛斥：“孔老二这只黑甲鱼！”以下就不知所云了。到了批邓时，又上台叫一声“黑甲鱼”！待“四人帮”倒台，又是一声“黑甲鱼”！

一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墙里日子不好过。不少样板本来与同事亲密无间，或在本单位深孚众望，一旦成为样板，众人就敬而远之，甚至议论责骂。有人归咎于中国

人的忌妒心,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树样板过程中不正确、不光彩的做法是更主要的原因。如前面提到的那种方法所总结出来的事迹,要周围的人不认为是弄虚作假,把集体的功劳算在一人账上是很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样板本人再忘乎所以,矛盾必定会更加尖锐。

五

报酬递减规律告诉我们,在其他生产投资项目固定不变的条件下,连续增加一项投资时终究会到达某一点,超过此点,则追加投资所得的收益亦即产量的增加部分,必定会趋于减少。

我们不妨借用这一规律来看看树样板的效果。即使样板本身具有一定的先进行为,通过一定的表扬宣传,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超过了正常的限度,即使再发动更大的宣传攻势,效果也会越来越小。如果所树的样板本来就不具有什么先进行为,或者靠的是弄虚作假、无限拔高、欺骗舆论等不光彩的手段,那就不但不会有什么积极效果,而且会招致不满和反对。“文化大革命”中史无前例的树样板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那一个个反面样板、假样板显了原形,受到了历史的判决自不必说,就是那些的确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凡是被树为样板者,也无不受到公众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冷遇,失去了本来应有的声誉。更加严重的是,传播媒介的信誉因此而大大降低,人们宁可相信小道消息而不愿相信报纸上的话。对先进人物、先进单位的宣传,即使是完全实事求是的,再也唤不起人们以往的热情,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些都持怀疑态度。这种状况看来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改变。

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社会秩序正常、政治环境健全的情况下,树样板,或者说树典型,是不是一种可取的方法?我认为是否定的。

当然,我们应该宣传、表扬一切先进人物和事迹,但这和树样板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对社会客观存在的反映。我们也应该积极引导、培植各种先进因素,但必须提供公正的竞争条件,并根据它们的结果来给予评价,而不是像树样板那样根据既定目标给予特殊条件,以换取对某种路线、某项政策的肯定。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们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下,随时可以找到各种截然相

反的典型,离开了数量分析就毫无意义。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找到致富的亿元大款,也不难发现食不果腹的家庭;可以找到廉洁奉公的干部,也不难发现腐败枉法的官员;可以找到刻苦学习的青年,也不难发现终日玩乐的学生。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典型的数量以及它们在全体中所占的比例,又怎么来判断我们社会的实际状况、政策和措施的实际效果,确定我们的未来方向?离开了数量分析的典型,充其量只具有个体的感染力,并很可能被用于证明某位领导、某项政策的正确性。因此,政策或路线之能否被贯彻执行,主要取决于它本身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在实践中是否有效,而不是虚张声势,大造舆论。树样板的方法往往是在不成熟的条件下对它作了过早、过于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而且必然导致简单的模仿,使政策丧失活力,成为固定的模式。对典型的宣传也容易将一些在特定条件下的经验当作普遍规律,掩盖了政策或路线本身的错误和缺陷,推迟了发现和纠正的时间。

在政治透明度不高、传播媒介还不健全、全社会的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采取树典型的方法难免会伴随着形式主义、脱离实际、片面性的做法,也很难摆脱长官意志的影响,并缺乏有效的舆论监督和充分的群众基础,所以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原载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总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我所经历的抄家

对不满 40 岁的中国人来说,“抄家”一词一定相当陌生,甚至不知抄家为何物。因为在今天中国的法律中,已经没有抄家这一项,公民住宅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搜查或没收都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或经法院判决。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抄家是很普通的一种“革命行动”。特别是在 1966 年“文革”初期,一度抄家成风,在任何城镇中随时发生、随处可见。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赞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好得很!”的确,抄家是从北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开始的,但这股风刮到各地后,情况有所不同,我的经历就可证明。

当时我是上海市闸北区古田中学的英语教师。这是一所只有两个初中年级、几十名教师的新学校,只有三名党员,勉强够成立党支部。我是教工团支部副书记,积极要求入党。“文革”开始时,党支部组织“左派队伍”,成立核心组,我是成员之一,负责整理材料,实际成了支部书记的助手。

1966 年 8 月,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经广泛报道和充分肯定后,上海当天就爆发“破四旧”热潮,随之传来红卫兵上门抄家的消息。中旬某日下午,支部书记去闸北公安分局开会,原来是布置抄家。回校后,他立即向其他两位党员和我传达:市委得到消息,北京的红卫兵将来上海抄家。为了争取主动,避免混淆敌我界线,执行政策,市委决定发动红卫兵小将统一采取革命行动,由公安部门、里弄干部予以配合。接着宣布注意事项,抄家的对象由公安局提供名单,里弄干部引路确认,不能搞错,不能随意扩大。查抄的范围是金银财物、现金、反动罪证、变天账、枪支、电台等。要造清单,查抄物资要集中保管,防止遗失和破坏。要宣传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要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日常生活用品和粮票、油

票、少量现金等不要抄走，让他们能维持生活。对抄家对象要严格保密，不能走漏风声。

他带回来的名单有五家，西宝兴路的周某以前是米店老板，青云路一家是地主，济阳桥附近一家当过伪保长，另有两家已记不得了。接着马上开“革命教师”（已被“揪出”的“牛鬼蛇神”或被贴大字报多的对象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和红卫兵会议，由支部书记布置动员。当时学校党支部还牢牢地控制着局面，红卫兵基本都是原来的少先队干部和出身好的学生。接着分工，周某家估计缴获最多，由大队辅导员 T 带头；抄伪保长这一队特意指派复员军人 Y 参加，以便万一发现枪支时能现场处理。每队指定一位教师负责登记查抄物资，回校后由老党员 W 集中保管。我负责各队及支部书记间的联络。那时还没有手机，公用电话也不多，骑自行车来往是最快捷的联络方式。

天黑后，各路整队出发。我随同其中一队，将到目的地时，果然见民警在等候，然后由里弄干部领至被抄对象家。大概事先已被看管，主人在家恭候。红卫兵一拥而入。可是那家地主只有一间棚户房，家徒四壁。红卫兵宣布采取革命行动，经过政策宣传，那地主交出一只戒指。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红卫兵很快将屋子翻了个遍，实在找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见有不少各色纽扣，就当作战利品交给负责登记保管的教师。红卫兵向地主追查“变天账”，地主不知所云，立即挨了一巴掌，被斥为不老实。我悄悄叮嘱红卫兵干部“不要武斗”，已有人在砸墙角，往地下挖，看能不能找到反动罪证。我知道不会有什么收获，但又不便多说，只是让负责登记战利品的女教师务必管好财物，就离开了这一家。

接着我到西宝兴路周家。周某原来是开米店的，靠马路是店堂，里面是他的住宅，有几间平房，还有一个小院，在这一带算相当阔气的，去抄家的红卫兵和教师大概从未见过。等我到达时，屋内已经翻了个遍，橱柜箱子都已打开，但除了衣服、几件小首饰和少量现金、粮票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的学生找到一个番茄酱罐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一定要砸开看，还说要看看里面会不会藏着什么。红卫兵正在院里批斗周某，他赤膊穿一条短裤，低头举着双手，衣服被汗水湿透。红卫兵高呼口号后，要他老实交代将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藏到哪里去了，他虽然不断求饶，却一直说实在没有。

有的红卫兵急不可待，已经在房内撬地板，砸门框。我让红卫兵暂停一下，到院

内休息,将周某带到屋内,让他坐下喝点水。我对周某说:“这次抄家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要抗拒绝没有好下场。如果能自己交代,老实配合,红卫兵一定会根据党的政策,只查抄金银财物和反动罪证,生活用品会留下,不会影响你家的正常生活。查抄的物品都会登记,留下清单,以后会根据党的政策处理。你要不交出来,红卫兵挖地三尺也会找,到时候房子也毁了,你还得从严处理。”我还说:“我们是正规的红卫兵,是通过派出所、里弄来的,还有党支部派来的老师,严格执行政策。要是碰到自己来的红卫兵,东西抄走了连收条都拿不到。”看到他欲言又止,还在犹豫,我又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命要紧还是钱要紧?你听我的话,我保证你的安全。只要把东西都交出来,红卫兵不会砸房子,也不会再斗你,办完手续就离开。”这时他说:“老师,我听你的,你说话要算数。”我说:“你放心,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交出来还是算坦白的,一定会宽大。”

他带我走到一个房间的门口,告诉我可以将门上的司必灵锁取下。原来在锁下面有一个洞,里面藏着两根小金条。之后又在一堆衣物中找到一个枕头,拆开边线,里面藏着一叠人民币。我肯定他的态度有转变,又说:“如果你真的愿意彻底交代,争取宽大,就应该先将最大的东西交出来。我们知道你不止这些。”他迟疑了一下,带我走到院子里,指着矮篱旁一根竹子,说在这里面。这根竹子顶上糊着石灰,敲掉石灰,下面露出油纸包着的一段硬物,原来是一根十两的金条。他说:“是老早就放在里面的,不是因为知道你们来抄家才转移的。”的确,竹子已很旧,石灰也是干的。我说:“你有实际行动,我们相信你,你可以慢慢想,不要漏了。”就这样他一件件交出来,老实说,要是他不交,就是挖地三尺,一时也未必找得到。最终获得的战利品是三十多两黄金、几件首饰、一千多元现金、一批毛料衣服、皮箱、电风扇等。

此时已过午夜,学校食堂用黄鱼车(三轮运货车)送来肉包子、稀饭。因为战利品多,得等天亮后找一辆卡车运回学校,红卫兵留在周家,或席地而卧,或坐着打盹。我让周某与家人睡觉,他说哪里睡得着,开始整理扔在地上的杂物。

第二天一早,从附近工厂调来的一辆大卡车开到,我们边往车上搬东西,边写清单。我根据事先传达的政策,也为了兑现承诺,给周家留下了不少维持正常生活的财物,如一百多元现金、所有的上海粮票等票证、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器具。如一新旧两台电风扇,只拿走新的;零星的衣料、旧的皮箱也没有拿走。全国粮票都抄走,因为拿了全国粮票可以到外地用,要防止资本家外逃。

T 和一些红卫兵颇有意见,认为我过于宽大,但因为那时我是学校公认的“左派”,又是党支部组织的核心组成员,没有人怀疑我立场不稳。但周某颇有些得寸进尺,不时请求红卫兵留下某件物品,惹得 T 大怒:“老实些!谁跟你讨价还价!”我怕周弄巧成拙,也训斥他:“我们会掌握政策,你少啰唆!”装完车后,我让周某在清单上签字,又将一份清单交给他保存,满载而归。

其他几家都没有抄到什么值钱的东西,伪保长家也没有发现武器(但据说后来被其他单位抄到了)。因为当时只规定上报清单,“抄家物资”暂时由学校保存,我们专门腾出一间储藏室保管,仍由 W 负责。后来学生要烧图书馆中的“封资修毒草”,我与管理员在夜间将可能惹麻烦的书挑出来,也放在这间房内。到 12 月时出现“造反派”,接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党支部的权,成立革命委员会,W 始终管着钥匙,这间屋子安然无恙。

据我所知,这样一类由公安局安排的抄家进行了几天,但红卫兵或“革命群众”自发的抄家延续时间更长,次数更频繁。当时有些中学党支部已经失控,只要红卫兵提出要抄家,就没有人敢阻止,所以几乎每位中老年教职员或出身不好的青年教师都给抄过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一些目标大的对象,往往一批抄过又来一批,甚至不知道来者是哪个单位,东西给谁拿走。有的被抄对象不得不请求所在单位贴上布告,证明已由本单位红卫兵抄过。一些中学生的抄家是毁灭性的,不管抄到什么,能砸的全砸光,能搬的全搬走,根本不留什么收据清单。

当时是抄家的初级阶段,目标是金银财宝、“四旧”和反动罪证,不像以后“清理阶级队伍”或“一打三反”那么专业,有特定目标。反动罪证五花八门,有的令人啼笑皆非。如一些原工商业主家中或普通人家中往往会留有旧账本,红卫兵发现后一概称为“变天账”,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或徽记,或有孙中山、蒋介石头像的毕业证书、奖状、证书、纸币,有“中华民国”年号的,有“反党分子”(如当时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或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照片、姓名的文章,都成了反动罪证。

本校一位中年女教师因父亲属“反革命”,抄家时也顺便到她家扫了一下,谁知发现重要罪证——原来她用旧报纸剪鞋样,而报纸上本来有毛主席的照片,剪过后就不完整了。更严重的是,在毛主席的身上还有一个个针眼。她当场被打为“现行反革命”,作现场批斗。幸而学校党支部没有将她列为运动对象,她还能将学校当作

避风港,尽可能早上班晚回家。

一时间上海风声鹤唳,“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含已摘帽的)、“牛鬼蛇神”(揭批对象,尚未定性处理)、“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流氓阿飞”自不用说,就是一部分劳动人民也胆战心惊,因为出身不好或有问题的亲友关系都会被株连,有的就因被怀疑接受抄家对象的转移而被抄。而且一般家庭也免不了有点金银首饰或“四旧”。

当时和事后都听到过一些无法证实的传言:有人将金条包起来扔进苏州河,清洁工在阴沟里拣到大批珠宝首饰。但确有其事的是,银行收购黄金白银的柜台前排着长队,拿着金戒指、“小黄鱼”(一两的小金条,当时牌价96元人民币)、银圆来兑换的几乎都是老人、小孩,因为真正的主人不敢露面。几天后,这种情况大概引起红卫兵的注意,银行宣布暂停兑换。“文革”结束后,上海的报纸上曾刊登过一条消息,抄家时有人将大量金银财物交给属劳动人民的亲戚保管,当时自然不会有什么收据或清单。事后双方发生争执,一是双方所说数量相差悬殊,一是接受方称是赠送而不是保管,最后只能对簿公堂。

报上刊登过北京红卫兵抄家的伟大成果:价值多少的金银财宝,多少反动罪证,使阶级敌人闻风丧胆,大长了红卫兵的威风。还举办过展览会。但上海似乎没有这类综合报道,也没有举办过大规模的展览会。有些单位在内部举办过战利品的展示,或者让抄家对象手持抄出的罪证,甚至穿戴上查获的“封资修”“奇装异服”接受批斗,游街示众。

我所在的学校后来调入两位教师,在“落实政策”和清理抄家物资时我得知,其中一位的父亲是资本家,抄家时发现几十两黄金,藏于煤球炉的四壁。另一位表面家庭贫困,母亲经常到菜场捡菜皮,子女衣衫褴褛,但偶然被抄到上万元现款,为此一直在审查,最后查不出什么疑问,却不知怎么处理这笔钱。

当年冬天,一些被抄对象请求领回过冬的衣被,或发还一些钱。我们学校只抄了几家,也没有抄本校教工,记得只有一个人来过。经请示上级,可以按实际情况处理。大概到了第二年,各级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上面通知可以允许被抄对象适当领回一些生活用品。过了一段时间,下达了对抄家物资的处理办法,要求各单位成立清理小组,与被抄对象核对查清后,除必要的生活用品可以发还外,金银由银行按国家牌价收购,其他家具衣物等交旧货商店变卖,全部收入存入银行冻结,等待“运

动”后期处理。“四旧”和反动罪证上缴统一处理。我们学校保存的东西不多,除了周家抄来的,其余的都不值钱,且全部有清单,大多退回了,这项工作仍由 W 办理。

但大量被毁灭性抄家,或者根本不知道抄家者是谁,更不可能留下清单的人就惨了。他们既无法证明家中的损失,又找不到追索对象,连本单位也爱莫能助。据说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只能适当予以补助。

一时间,淮海路旧货店等处堆满了各种抄家物资,皮大衣、料子衣服、红木家具、沙发、电风扇、收音机、照相机、留声机、钟表、工艺品应有尽有,店堂里放不下,人行道和马路边上也堆着。一把红木椅子只卖 10 元,一套皮沙发几十元就够了,工艺品更不值钱,却没有什人买。因为高收入的人大多被抄被斗,工资、存款已被削减或冻结,住房也被紧缩,一般家庭住房狭窄,就是白捡也没有地方放。更重要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没有什么人敢保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倒是劳动人民无所顾忌,只要买得起、家里放得下就行。我看到了梦寐以求的英文打字机,以往多少次走过南京东路那家商店,看着玻璃柜里标价上百元的打字机,如今成批堆在地上,最多几十元就能买到。我挑了一台 30 年代的 UNDERWOOD 手提式打字机,花了 25 元。那时我住在学校,每天都公开练打字。我不怕有人说我走“白专道路”或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因为我打的都是英文的《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或《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我完全按照正规的盲打训练,至今获益匪浅——用五笔法每小时可以轻松输入四千字。那台打字机我一直使用到 1986 年,以后又给我几位研究生练打字。

1979 年春天,我已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一天下午,我正在图书馆看书,有同学告诉我宿舍有人找我。回到房间,见有一位不认识的老人坐着。他自我介绍说是西宝兴路的米店老板周某。他千恩万谢,说幸而当年是由我去抄家,让他渡过难关,现在落实政策,按清单完整无缺,连全国粮票都没有缺。又说他到我原来的中学问到我的地址,得知我考上了研究生,“真是善有善报,你现在高升了”。我顿感惶恐,抄人家还能算善事?连忙解释:“这是党的政策,我只是按政策办。”寒暄毕后,我才得知他的来意,现在有一张外国股票可以兑现,家里却找不到原件,问我有什么印象或线索。我告诉他,当时只注意金银财物,也不懂什么股票。要是被红卫兵当成“反动罪证”,早已被撕了毁了。要是没有被发现,也可能在混乱中遗失了。既然连粮票都一一登记,要是真有这张纸,清单上不会缺少。他说当然相信我们认

真负责,只是想了解我有什么印象。我说:“要是知道股票这么值钱,肯定会注意,可惜当时连股票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会有印象呢?”我劝他赶快按遗失的结果想办法,因为不会有比我更了解的人了。

四十一年过去了,当年的抄家者和被抄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可能已记忆不清,有的不愿再保留不堪回首的记忆,有的甚至还在炫耀自己的“革命行动”。我倒希望有亲身经历的人都能记录下来,毕竟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原载《人间世》第二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年版。

我经历过的“学生政审”

所谓“政审”，就是“政治审查”的简称。这曾经是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成年人或中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所必须经历或熟悉的过程——因为从理论上说，人人都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的“政审”。

在一个“政治统治一切”、什么事情都要“讲政治”的社会，对每个人都要进行政治审查，对每件事、每个人首先必须从“政治角度”作出评价，是完全正常的。而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阶级地位和阶级烙印就被解释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政审是从调查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开始的。

进一步的政审，就要根据不同的要求，如入团、入党、参军、提干、当劳模、评奖、享受各种荣誉、当选代表或委员、成为统战对象、出国、升学、从事某种工作、执行某项任务，甚至能否在某地居住、与某人结婚、上山下乡的方式（插队、农场、军垦）或地点（内地、边疆）等，对本人的历史和言行进行审查，或者扩大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审查范围。这些都属于常规的、普遍的审查，结果是合适或不合适，或者需要对审查对象实行哪些限制，而不是处理或处罚。如果在政治运动中或针对某种案件，就需要成立“专案组”，设立专案审查，对审查对象专门作结论，作为最后处理或惩罚的根据。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的成年人，人人都是被政审的对象，只是审查的方式有所不同。而要进行如此广泛而深入的政审，也需要大批不同等级的政审执行者。我出生于1945年，于1964年入团，同年高中毕业，1965年正式参加工作，并提过入党申请，“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已经成年，“文革”中一度要借调

我进市“写作班”，曾报名支援西藏，1976年几乎入党，1977年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当选为市人大代表，1978年考取研究生。我相信，这中间已经历过无数次政审。但这些年，我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最多偶然听到经办者透露有那么一回事。但从1968年开始，我被挑选进了所在中学的“材料组”（“专案组”的别称），参与审查运动的对象。一年后，学生开始“上山下乡”，接着又有了毕业分配，我兼做学生的毕业政审。“文革”后期共青团的活动恢复，我担任校团委书记，负责团组织的建立和新团员的发展，又需要对入团对象作政审。直到我考取研究生离开中学，我做了十年的政审，可以说说我的亲身经历。至于在材料组的经历，因为与政审并不完全相同，留在以后再说。

在上海市区，小学生毕业时还没有什么档案，转入中学的只有成绩单（包括其中的品德评语）和一张登记表。学生的家庭出身、父母亲的工作单位、政治面貌、本人曾经担任过什么干部等一般都根据学生自己的填写，个别特殊情况由校方或班主任注明。入学前后，校方都不会专作政审。对需要担任少先队、校级或班组干部的学生，一般只是通过与原来的小学联系了解。

但到中学毕业（“文革”前分高中、初中，“文革”期间合并为学期为四年的中学）前，就必须进行家庭情况与社会关系的政审，填写一张政审表，放进学生档案，转入他（她）下一阶段的工作、学习单位或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在毕业前的半年（有时因人数多开始得更早），学校就要派人去每位学生家长所在单位，通过查阅本人档案，摘录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奖惩记录、有何审查结论或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然后交单位核对无误后签署意见，盖上公章。

父母双方材料齐全后，由政审人员填写表格，摘录的材料作为附件，放入学生档案。父母工作单位不在本市的，可以通过人事部门进行“函调”，对方人事部门会按要求摘录盖章后寄回。一般对方单位都很重视，会按时寄回。但遇到特殊情况，如对方单位还在“武斗”，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或者档案被封，或者被调查对象正在审查等（这些情况在“文革”中常有），就可能到学生将离校时还未收到材料。那时打长途电话既贵又难，而且根本查不到外地单位的电话号码，所以只能一次次发信催。

正常情况下，这项工作是由学校的专职人事干部做的，但由于工作量大，也可以组织教职员中的党团员协助。我所在的中学“文革”前刚建立党支部，只有三位党员，还没有专职人事干部，加上“文革”中的特殊情况，工宣队材料组的成员（包括我

们几位参加的教师)就承担了这项工作。每年有上千毕业生,得摘录两千来份档案。那时我年轻,骑自行车,查档案和摘录速度快,又住在学校,所以全校学生多数是由我政审的。

查档案需要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专用介绍信,我们先开了“校革会”(学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的介绍信和名单,再到“区革会”(区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地级单位)开介绍信。由于量太大,介绍信得一本本地开,后来就让我们领回空白介绍信,事先开好到区里核对盖章。接待单位只认县级以上的公章,专职人员一看公章的直径就明白了。但“文革”中有的单位是新建立的,有时会因“区”的介绍信而拒绝,这时就得解释这个“区”比县级还高。介绍信上必须有调查人的姓名和政治面貌(党员、团员、群众),按规定,只能查与自己身份相当的对象,如团员或群众不能查党员的档案。群众和一般干部的档案保管在所在单位,一定级别的党政干部、统战对象或特殊人物的档案保管在上级单位或特别部门,到那里去才能解决,而且不一定就让查阅。遇到家长是党员或干部,我们非党调查者可以请对方人事干部代查代填。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或对方不愿代办,只能另派党员去调查,或专门给上级部门打报告,获得批准后再去查阅。我们的家长中最高级别的是局(厅)级干部、老红军(抗战前入伍)和市劳模,有的表格是由单位代填的,非常简单:某某,党员,副局级干部,其他项目一概空白,或填上一个“无”字。“文革”前期党组织陷于瘫痪,所以不少单位只要有介绍信就能查档案,常常会把党员、干部的档案给我这非党员看。但如果接待者是原来的人事干部,一般都遵守规定,至多抽出一张登记表之类让摘录一下。其实,为了工作便利,我们倒是希望只抄一张表格。

那时中学是就地招生,按学生的居住地分块,家长的工作单位相对集中。如学校附近的3516厂,就是家长最集中的单位。每次政审,我们将名单交给工厂人事部门,去抄上两三天,百来份政审材料就完成了。但一大半家长的单位都是分散的,得一个个去,有的还在郊区。那时交通不便,一天只能跑一个地方。去崇明县要坐轮渡,当天无法往返,一般都发函调。

如果家长没有正式工作,如不少学生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或只在里弄生产组工作,有的父母是临时工、外包工,他们的档案得到所属派出所去查,多数人没有档案。对这些人就抄户口本,然后找户籍警或居委会主任核对一下,由派出所盖章。但如果情况比较复杂,如属刑满释放人员、“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右派分子,实际包括“摘帽右派”)或者“内控”(内部控制的对象),就比较麻烦,他们的档案有的在原判处单位或原来的工作单位,有的还在外地劳改单位。但这样的对象恰恰是政审的重点,非查不可。

我政审的对象大多属“劳动人民”,档案袋中只有薄薄几张纸。但“有问题”的人档案会有几大包,如何能不错漏地摘录,又节省时间,既需要正确判断,也得依靠经验。刚开始时我逐张翻阅,速度很慢。后来才知道,自传、检举揭发材料、旁证材料、调查笔录等不必看,只要找到主要表格或审查结论就可以了。有的结论很不规范,如有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栏中所填往往与政策不符,或者纯属杜撰,有的结论前后矛盾,时间不对,等等。遇到这种情况,就得找人事干部或单位负责人。有时他们也解释不了,或不知所云,那就拣轻的抄,或者在征得他们同意后不抄。有时翻到一大包材料,出于好奇,我会仔细阅读,倒了解了一些平时从来没有机会了解的情况。其中不乏一些骇人听闻的事实,使我感受到了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残酷无情。

如一位被枪决的“恶霸地主”的全部材料就是一张草草书写的“判决书”,没有任何旁证材料。记得有一次到“提篮桥”(上海市监狱)抄来一份材料,此人因贪污判刑三年,罪行是当公共汽车售票员时贪污了几十块钱。检举揭发他人的信件,特别是针对领导的,往往留在本人的档案中,还加上领导要求对该人调查的批语,甚至已作了“恶毒攻击”“阶级报复”等结论,可怜本人还一无所知。

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人填表格或写自传时都极其忠诚老实,特别是在政治运动中,或自认为出身、经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的人,都点滴不漏,唯恐涉嫌隐瞒历史,欺骗组织。那些要求入团入党、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更将这当作相信党的具体行动,往往连道听途说的话也会当事实交代,心里有过的想法也要汇报。如有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当码头工人,拉黄包车(人力车),为了相互照顾,拜过把兄弟;或者为了寻求庇护,拜过师父。在填写社会关系时会写上:结拜兄弟某某系恶霸,被政府镇压;或师父某某,听说逃往台湾。有人上过大学,会将同学作为社会关系一一列出,其中免不了会有“去美国留学未归”“随蒋匪逃台”“是青团骨干”等。于是,明明本人属“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或党员干部,却已列入“内部控制”,在档案中写上了“有反动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复杂,有逃台蒋匪特务”。到“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这些人往往成为重点审查或批斗对象,甚至成了“里通外国”“敌特嫌疑”,本人受罪,还祸延子女,使他们在入团、分配工作时受到种种限制。

毕业家庭政审一般限于父母,但父母双亡的则还得调查抚养者(监护人)。如直系亲属中发现有“杀(被判死刑)、关(被判徒刑)、管(被判管制、劳动教养)”对象,则还得补充调查,至少要抄到正式结论。

这份政审表格就成为学生档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不管是下乡还是就业,都要带上这份材料。有的单位要先看档案,审查合格后才会接收。没有下乡或就业而留在家里的学生档案,到一定时候就转入所属派出所。

如家庭出身不好,属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往往包括已“摘帽”的),军垦农场和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等边疆地区的农村一般不会接收,除非是个别能坚决划清界限的积极分子典型。分配工作时,对进入国际海运、军工单位、“保密厂”、“要害部门”的人也会严格审查,有时还得补充调查直系亲属和重要的社会关系。对资本家、小业主、有“历史问题”但已作结论者、属“人民内部矛盾”的审查对象、经济问题(一般指“投机倒把”“多吃多占”“小偷小摸”)、生活作风问题等没有严格规定,往往因人而异。只要学生本人可以,一般会网开一面。

政审表格是不与本人见面的,班主任和其他教师也不能看,但对分配有一定限制的对象,会给相关教师提醒一下,不一定透露具体内容。教师往往颇感意外,甚至大吃一惊,例如最钟爱的好学生、学生干部就此与某些机会无缘。但当时人们都明白“政治”与“家庭出身”的重要性、神秘性,一般不会问,或不敢问具体情况。

对入团或当校以上干部,如市级、区级“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或团委的学生委员,如在家庭政审中发现问题,就要找本人谈认识。如果学生不知道,就让他们回家问父母,然后写成书面认识交来。如属阶级立场一类重大问题,还必须在入团审批会上公开谈认识,由团员视其深刻程度决定是否同意入团。隐瞒情况或认识不够的自然就此淘汰。

征兵的家庭政审要严格得多,不仅要查父母和直系亲属,还要查主要社会关系。不仅要抄结论,有问题还要摘录具体材料,包括正在审查或未作正式结论的问题。70届征兵时有位学生的父亲是3516厂的老工人,历史清白,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毫无问题,却受了档案中一句话之累。原来他在业余学文化时做造句,造了一句“我们都盼望蒋介石回来”。因为当时正宣传“和平解放台湾”,国家领导人说如果蒋介石愿意回来可以让他当副委员长,所以这位刚摘了文盲帽子、对“盼望”半懂不懂的工人写了这样一句话。结果可想而知,无论我们如何解释,部队坚决不收。他父亲来

找我询问原因。我内心十分同情,却不能透露,只能说些安慰的空话。

我还接手过比征兵要求还高的政审。一次是在“文革”后期,上海开始办外语培训班,按王洪文的说法,要培养“红色外交战士”“工人大使”。从应届中学毕业生中挑选,经审查合格后直接入学。那次我们中学分配到一个名额,先挑出几位表现好、家庭出身等方面尚未发现问题的学生,初审后进行比较,集中在一位父亲是党员、一般干部的男生。对他的政审遍及所有能找到的家庭成年成员和社会关系,最后报送成功。

学生本人的表现一般由班主任写评语,“文革”中一度改为由“红卫兵排”(相当于班委)或“革命小将”自己鉴定。实际上教师害怕得罪学生或影响学生分配工作,都不敢再写。学生自己写的,接收单位也不会当真。我负责管理全校差生,有不少学生自己写的检查、“认罪书”,还有公安局、派出所、“文攻武卫”(一度存在,相当于治安队、联防队)等转来的材料,这些都不是正式的处理决定,都不随档案转出。个别学生被公检法^①判刑或送劳动教养的已经被开除,我们不必再管。一般性拘留审查的不算正式处理,材料留在公检法。

相比之下,学生本人的材料反而不如家庭出身重要。我的记忆中,除了毕业后出了什么事,所在单位来校了解,我们从未在毕业生档案中主动附什么材料。某年盛夏的一天下午,我们突然接到无锡传染病院打来的电话,称我校一位学生正在该院,有重要“政治嫌疑”。我与一位工宣队材料组组长连夜乘火车赶去。原来该生在其姐工作的医院过暑假,有人在公厕蹲坑旁发现“打倒毛”三个字,经当地公安局侦查,他是主要嫌疑对象。我与他谈了一个上午,软硬兼施,他都没有承认。我越来越相信非他所为,坚决要求对方提供证据,看到了公安局的鉴定书原件,上写“因送检字数太少,难以比较,该人书写的可能性较大”。我以鉴定不符合规范为由,拒绝接受该材料,将学生带回。此事在我校从未公开,连班主任都未告诉。不久该学生毕业,从未听说有任何“反动”行为。

不过,在这十年间,经我们之手产生的“政审材料”,更多的是使一些学生从毕业之日起就戴上了无形的枷锁,受到种种限制和不公正待遇,被打入另册。而本人及家人可能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为其中大部分纯粹出于冤假错案,或极“左”、教

^① “文革”初,原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由部队进驻接管,以后合称“公检法”,至“文革”结束后才恢复正常。

条、不负责任的做法。要不是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或许我会一辈子做这样一件名为“坚持政治方向,贯彻阶级路线”、实则伤天害理的事。

如今,我作为研究所所长、图书馆馆长,先后接收过很多硕士、博士研究生和新员工。他们都有档案材料,但我从来没有去查过他们的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我重视的是面试,看重他们的实际能力和表现。每当他们被愉快地录取、录用,或拿到毕业证明、获得学位时,我不由得感叹:“年轻人,可知道你们有多幸运!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你们就能获得这一切。”

原载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总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青春无奈(二则)

这几年常听到“青春无悔”的口号，特别是用于回忆知青上山下乡或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及各种政治运动，以表示回忆者的达观，显示其“革命豪情”，并影响没有这类经历的青年一代。对此，我绝不赞成。

这完全是歪曲历史。所谓“无悔”，只能是就个人曾经作出的选择而言，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选择的自由，完全是在被强制或受欺骗的情况下才参加或卷入，只能说是无奈。

这完全是在欺骗。既然“无悔”，何不干下去？但高唱“无悔”的人今天基本都是官员、企业家、学者、富人、名流、留学生，至少已回到城里安家立业并进入小康，有几个还在农村、山区战天斗地？既然“无悔”，完全可以回去，或者把子女送去，但有人这样做吗？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那些人“无悔”的事物，都与“文化大革命”和此前的极“左”路线密切相关，他们“无悔”的结果，岂不是在用事实肯定这场浩劫和此前的序幕？莫非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

所以，当我在回忆自己从“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至“文化大革命”的经历时，深感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并非是由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这段历史所造就的。是的，我们曾经被愚弄，被欺骗，被压抑，也曾经被煽动，被吹捧，被利用，既作为“革命动力”，也当过“革命对象”。我们当然应该深刻反省，但毕竟青春无奈！

中学生活自然也给我留下过美好的记忆，特别是在人到中年后，更免不了会感叹岁月无情，青春难再。但我宁可为了未来而走向死亡，也不愿意再回首那无奈的青春。不过，为了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历那样可怕的年代，我不得不一次次回忆并记

录下这段无奈的青春。

我正在撰写我的回忆,下面先摘录二则:

中学生的“大跃进”

我是1957年进中学的,“大跃进”兴起时正读初二,当时的狂热和荒唐至今记忆犹新。

印象最深的几件事,一是“放卫星”。

当时报上每天都在“放卫星”,各种奇迹不断涌现,产量天天翻番,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哪里知道什么真假?整天唱着“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共产主义就在眼前”,沉浸在狂热之中。不知是因为学校领导布置,还是少先队员出于革命热情而自发行动,或者兼而有之,学校里也开始“放卫星”了。开始的口号还比较谨慎,如有的班级提出“消灭不及格”,但在其他班级“消灭3分(五级记分制,相当于及格)”的口号面前,马上有人放出了“全部5分(优)”的“卫星”。可是不几天,“全部5分”的口号也显得保守落后了,因为据说别的中学已提出在初中学完高中课程,有的学生还准备著书立说。

于是,一个个具体的“卫星”放起来了:如三天消灭错别字,办法是每天测验几次,教师来不及批,就组织学生批,甚至相邻座位互相交换批。很快就有班级向校党支部报喜,最近一次测验证明全班已消灭错别字。消息传出,其他班级也喜报频传,不到三天全校就放了“消灭错别字”的“卫星”。

又如全部通过“卫劳制”(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标准,初中生虽然是初级,但也有规定的指标,如60米跑、400米跑等都有具体的时间,短短几天之内如何能全部达到?于是没有通过的学生就在操场上不停地跑,累了就歇一下再跑。在这种情况下,照理不可能越跑越快,但一遍遍下来,不通过的人居然会越来越少。直到天黑,不知是学生们真的越跑越快,还是计时的教师也放了“卫星”,奇迹终于出现,全校学生全部达标,报喜的锣鼓又敲到了党支部办公室门前。

二是大炼钢铁。“钢铁元帅升帐”似乎是当时的头等大事,记得具体的口号是“为1080万吨钢而战”,以后指标又成了1800万吨。不久就轮到中学“大炼钢铁”了,教师和一些身强力壮的学生在操场上建起一座炼钢炉,其他学生全部出动收集

“废钢”。我们那所中学是新建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废钢，学校周围是棚户区，都是非常简陋的房屋，几乎没有钢铁可拆，大家就跑到苏州河以南的住宅区，将弄堂口的铁门、一些房屋上的铁栅铁栏全部拆下砸碎，有的同学还把家里的铁器拿来，有的工厂放在马路上的零件也被当废铁搬了回来。晚上操场上炉火熊熊，师生们挑灯夜战，终于把“废铁”炉成了一堆黑乎乎的“钢”，接着就是抬着这堆“钢”报喜——不是向本校党支部，而是游行到区委。

再就是消灭麻雀。除了平时用各种方法完成这项“政治任务”外，还有集中的行动。记得全市消灭麻雀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了学校，我分到的任务是和一批人一起爬上三楼屋顶，见到麻雀飞过就高呼驱赶，不让它们停留。四周到处都有人放鞭炮，敲锣打鼓，挥舞旗帜，奔跑呼号，各显神通，据说战果辉煌。虽然我们在屋顶没有抓到一只麻雀，但都相信自己为“灭四害”尽了力。

我个人还有过一项“大跃进”的成果。我们去育才中学参观了教育革命展览会后，学校提出要实现“电化教育”。我积极响应，向地理教师建议制作一件“电化教具”。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木框上放一张全国地图，底下用不同线路安装不同颜色的小灯泡，用开关分别控制，演示时根据需要开灯，分别显示城市、铁路、河流等内容。学校给了我们一笔经费采购小灯泡、电线等，木工为我们做了木框，我和一位同学夜以继日忙了几天才制成，送往展览会向党献礼。但以后再未见到这件教具的下落，教师自然没有用过。

饥饿的记忆

初中时，学校附近的街道办了食堂，虽然还不像一些“共产主义”的典型或农村那样“吃饭不要钱”，但价格也相当便宜，所以我还能从有限的饭钱中省下几毛钱买书。可是等我1960年进高中时，粮票的重要性已经尽人皆知。本来在饭馆用餐、在点心摊买早点是不要粮票的，但后来不收粮票的地方越来越少。特别是廉价饭馆和点心摊，每天供应的数量已很少，顾客必须提前排队，或等上很长的时间，才能买到限量供应的一份。为了省下粮票，家里人曾几次到浙江路一家面店门口排队，轮得到的话，每人可吃一碗素交面（就是在面条上放几小块冬瓜）。不久，所有的漏洞都给堵死了：饭馆、点心摊凭“就餐券”供应，食品店的饼干糕点凭“糕点券”，与粮票一

样严格配给。

进高中后我一直在学校的食堂吃包饭,午、晚餐都是八个人一桌,饭量可以各人自定,每人有固定编号的碗。女同学大多定三两一顿,男同学普遍是四两,个别有定五两的,食堂根据所定数量放米蒸饭。由于炊事员放米放水未必精确,有时四两的饭还不如三两多,有时同样的定量却相差很大,当时同学间虽还相当克制,但心里却不能不计较。如果同学间拿错了碗,定量少的吃了定量多的,那就更加尴尬。轮到十天半月一次吃肉,大家就像过节一样,但轮到分菜的同学负担就特别重,要是菜盆中的八块肉大小相仿还好办,要是有一大一小就麻烦了。开始时菜盆里的青菜数量还是充足的,尽管几乎没有油水;以后连青菜也不见了,只有一些卷心菜的老叶。到了冬天,饭碗里经常是“光荣菜”。所谓“光荣菜”,就是以原来喂猪的豆腐渣为主,放少些菜叶、豆腐一锅煮成的。味道是不能计较了,再说这也是“政治”立场,再不好也得吃。由于数量不少,吃下去的时候倒很饱,只是维持不了多少时间。

在家吃饭也同样吃不饱,因为除了凭小菜卡按人头买到的蔬菜(基本都是卷心菜的老叶)和凭票买的几两肉、几分钱豆腐外,一切食品的来源都已断绝,所以每家每户都在为了让这少米、无米之炊塞饱家人的肚子而各显神通。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办法是先将米炒熟再做饭,原来的一碗可以变成一碗半,吃饭时皆大欢喜,但也解决不了吃下一顿前的饥饿。报上还介绍生产小球藻,用人的粪便喂猪,将饲料省下来掺入粮食一起吃。学校的生物教师辅导大家养小球藻,到处是一个个盛着发绿的水的瓶子,可是从来没有人吃过据说极富营养的小球藻。用粪便喂猪的确实行了,但人本身已极其缺乏油水和营养,粪便中还能有多少有效成分?所以当时偶尔吃到的猪肉也是皮连着瘦肉的薄薄一片。

最倒霉的大多是各家的主妇、母亲,为了让家人和子女多吃一点,往往只能自己忍饥挨饿。但在一些多子女家庭,即使母亲整天挨饿,也无法解决子女间的争夺,往往只能采取分食制。我家的邻居家有六七个孩子,最大的是我同学,每天早上,母亲按各人定量将全家当天的粮食分好,然后各人自己决定如何吃。所以他家的煤炉整天没有空,特别是分了面粉后,有的做面条,有的摊饼。当然母亲做好了菜后也得分配,否则就无法使每人都吃到。

在饥饿的日子里,吃了上一顿就在等着下一顿,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时,都在盼快点下课。当时高中生根本没有手表,个别家里有钱的同学也不敢戴手表。轮到

们坐在靠窗一排时,就在课桌上放一个钢笔套,记下太阳影子的长度,用这方法来估计时间,又通过手势或纸条告诉其他同学。饥饿和营养不良不仅导致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发育迟缓、身材矮小,而且患上各种疾病,每次体检都有新的结核病人被发现。我在1962年5月的体检中查出患浸润型肺结核,只能立即休学,一年半后勉强复学,因原班级已毕业,转入下一级。但到1964年高中毕业时,肺结核尚未钙化,体检仍不合格,因此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

经常性的形势报告和政治学习使我们深信,饥饿是由“连续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造成的,并且是暂时的。当我们听到“毛主席已不吃肉了”的消息时,更感动万分,因为我们毕竟每旬有二两肉票呀!伟大领袖的生活比我们还艰苦,于是我们咬着牙省下一二斤粮票上交团支部。我们更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没有解放,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虽然吃不饱,但党和政府还配给粮食和生活必需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会管吗?要是他们那里遇到这样大的自然灾害,劳动人民不知要饿死多少!

在学校附近的北火车站一带曾出现一些从乡下逃出来的饥民,个个瘦得皮包骨头,先是要饭,说快饿死了,哀求救他一命,但哪里要得到?于是他们就开始抢吃的,从别人手里抢过大饼、油条,拼命往嘴里塞,任凭如何打骂,他们一概忍受,只是死不吐出到了嘴的食物。实在无法一口吃下的,如半碗稀饭,也会吐上一口痰,使你只得让他吃了。学校立即进行思想教育,说明这些人都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愿老实接受劳动改造才逃出来。不久这些要饭的果然被统统赶走,我们自然毫不怀疑他们是罪有应得。

原载《文汇报》1999年9月17日;《我的中学时代》,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